

独立阅读

致力于公民社会的常识阅读

2009 年 8 月

细则

- 1、阅读报告力求独立但不宣称中立，撰写过程谢绝图书作者、出版者、发行者介入，观点尊重个人趣味，不求客观统一。
- 2、自 2007 年 7 月 1 日起，独立阅读执行编辑谢绝出版机构赠书，赠书将自动排除出推荐行列。师友赠书将注明图书来源，对于相关部分，读者可以抱十倍怀疑之态度。
- 3、独立阅读欢迎读者提出不同意见，将选登部分批评类读者来信，但谢绝只有观点没有论证过程的批评。
- 4、独立阅读观察员欢迎申请加入，但谢绝出版从业人员参与，来信烦请告知专长领域并附上阅读报告一份，连续三期撰写阅读报告将列入观察员名单，连续三期没有撰写视为自动退出；一年内在“独立阅读”发表三篇及以上文章者列入特约撰稿人名单，否则视为自动退出。
- 5、独立阅读欢迎订阅，凡订阅者将成为独立阅读的定向发行对象，在第一时间与独立阅读观察员、特约撰稿人共享阅读成果，读者来信、作者申请以及订阅事宜，烦请发信至shrbooks@gmail.com。
- 6、以往各期独立阅读均可在独立阅读网下载：<http://chinairr.com.cn>。

执行编辑：苏小和、王晓渔、成庆、言一、汪伟

轮值编辑：王晓渔

助理编辑：李伟为

观察员：文学：朱 白（广州）、朱航满（石家庄）

经济：苏小和（北京）

思想：成 庆（上海）

文史：王晓渔（上海）

艺术：言 一（成都）

特约撰稿人：戴新伟（广州）、羽良（北京）、严飞（美国·旧金山）、刘柠（北京）、汪伟（上海）、马慧元（加拿大·温哥华）、凌越（广州）、孙晓曦（北京）、张无极（北京）、罗四鸽（上海）、杨小刚（德国·图宾根）

翻译：陈丹丹（南京）、吴万伟（武汉）

编者按：

每次编完“独立阅读”，我总是在第一时间飞进书店，把那些感兴趣的书抱回家，一方面出于对作者们的信任，另一方面也想检测一下作者们是否值得信任。如果上当，立即发信严厉谴责，还好这种情况非常罕见。

为了以更少的时间了解更多的阅读信息，本期开设了“书单”栏目，试图打入作者们的书房内部，现场直播他们的阅读状况。让人惊奇的是，有时会有两位、三位或者更多的作者，在阅读同样的书。有共识，也有差异。对于重出江湖的《废都》，“独立阅读”的作者们势如水火、针锋相对，但请放心，不会产生肢体冲突。

没有共识，无法交流；没有差异，不必交流。“独立阅读”愿意呈现阅读中的共识和差异。

目录

阅读报告·中国大陆

写 作：朱 白

朱航满

思 想：成 庆

文 史：王晓渔

阅读报告·台港海外

曹开雄：沉默还是抗争

孙骁骥：勇士的年代

书单

羽 良 刘 柠

成 庆 汪 伟

贾 葭 戴新伟

孙骁骥 言 一

朱 白 王晓渔

书评

朱 白：科塔萨尔的伟大是评论家封的

凌 越：一种凸显勇气的晚期风格

罗四鸽：米勒的典型性中国之旅

孙传钊：生计与人生关键的选择

王晓渔：一场迅速平息的“暴乱”

译介

亚当·科奇：科学因何浪漫？

阅读报告·中国大陆

ESSAY&STORY 散文·小说

观察员 朱白（广州，zhubai@tom.com）

我实在搞不懂像《废都》（贾平凹著，作家出版社，2009年7月）这样的小说，到底好在那里了。如果说从创新等艺术角度讲，它唯一值得一说的就是在公开出版的当代汉语小说里突破原来有限的色情尺度。假使我们把“突破色情尺度”这个事当成一个好事来看，《废都》的突破也没啥了不起的，在公开出版的读物里《废都》算个话题，但在民间“色情”的表达从来没间断过，所以说它的突破尺度前要加上一些定语，把它限定在一个特殊的范围内。你知道，我们的关于色情的尺度，不取决于作家的想像力或者胆识，而是要看审查制度，有这个玩意在，再讲什么突破就没什么意思了。我觉得《废都》这样一部从头到尾皆泛滥着庸俗的作品，在这个时代如此被大而化之、被广泛议论以及阅读，实在是个不好意思的事，我是说，人们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审美？仅仅用被束缚久了来解释还是不能完全解释得通，因为我就听一个朋友说过，他真心喜欢《废都》这部小说。在我看来，《废都》不是表达了什么城市化进程中人的卑微和人性的一面，也不是表达当代知识分子的困惑和局限，而只是用一个土的掉渣的方式讲述了一个既庸俗又无耻的故事，它既没有打动人心的某种真诚，也没有人类共鸣的某种声音，只是一味掉进庸俗的肉体摩擦后得到一点可怜的快感……这都多大意思呢，值得大家这么广泛地阅读，还要在多年之后再版？我实在搞不清楚原因。更有不靠谱的评论不但将《废都》说成是经典中经典，还将之说成是《红楼梦》、《金瓶梅》、《围城》的完美结合，我的意思是，是不是以后再有哪个中国人写了一部宗教题材的书，就可以称之为《圣经》、《金刚经》、《道德经》的完美结合了？我觉得《废都》再版只能说明一件事，就是卑微的当代文学里在这十六年来没有半点的进步，不管是某些尺度还是文学性，十多年过去，再拿出这本泛着恶俗和廉价摩擦的小说，而且照样大卖——这应该看成中国当代文学整体继续落后的一个有形标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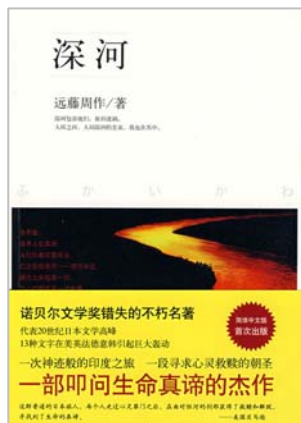


你应该能看得出来，说《废都》不足挂齿，不是因为道德等原因，而是纯粹的文学审视。为了证明这一点，举一个最近正在看的布考斯基的例子，《布考斯基煮了70年的一锅东西》（巫士译，台湾圆神出版社有限公司，2005年7月）等作品集里的素材大多集中在一个酒鬼的荒唐事上，粗俗的性描写更是比比皆是，但这不妨碍布考斯基成为一名伟大的小说家，在巨大文学价值面前，过于黄色啊、道德混蛋啊这些已经都不是问题，在各种外衣的包装下，布考斯基拥有自己最独特和完美的对人性的阐释。以前在网上零星地看过一些布考斯基的诗和小说，这次集中看他的作品，实在是巨大惊喜，比想像的还要好。有兴趣的“独立阅读”朋友可以到淘宝上找找。



短篇小说一直在看，尽管这是一个势利的时代（短篇小说对于出版来说，它缺少一部长篇那样的读者群，注定拥有了一个很难畅销的天性），但好的短篇小说集还是不断会出现。《跳房子》的作者科塔萨尔的短篇小说集《万火归一》（范晔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6月）值得关注，即便在看过之后我觉得从某种程度上来讲科塔萨尔实在是太执迷技术了，但能在这样薄薄一本小说集中，领略一个如此聪明的天才在那里炫技，也不会枉费你时间的。关于短篇小说，还有一本前两期错过介绍的《小说山庄》（周晓莘选编，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3月），尽管里面选的一些大牌的小说家，比如马尔克斯的《睡美人的飞机》、莱辛的《他》等显得有点水，但其他大量的听说过、没听说过的世界各国小说家的精彩之作，随时都有可能带给你惊喜，比如胡安·米利亚斯的《一个偷情者的自白》，你能看到作家对人性的一点的精彩绝伦的描述。

有人说爱情和宗教是人们最可以依赖的两种东西，大灾大难的今天，那就推荐两部以爱情和宗教为主题的小说吧。提起上海作家张旻，我非常想偏激而非讲道理地说，这是中国当代最值得期待的作家之一，尤其是这样一个在出了很多本书也不缺发表机会的作家，竟然还是非常惯例地在被我们忽略的时候，我就更想直接说出自己



的心里话了。张旻喜欢写中年男人的爱情故事，在看过了他以往的许多小说后，再来这部《邓局长》（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5月）时，张旻彻底地对他笔下的“爱情”做了一个最为残酷的戳穿行为，也就是说，张旻这一次是通过描写爱情以达到戳穿爱情本质的目的，爱情成了那最为软弱的一项人生遭遇。“爱情”在《邓局长》的结尾变成了虚惊一场，其实人生又何尝不是如此。关于人生以及人生里的诸多困惑，我以为，自己能解决的均不能称之为困惑，真正的困惑是那种一直萦绕而又无法击落的东西。日本作家远藤周作的《深河》（林水福译，南海出版公司，2009年7月），被称作“一部叩问生命真谛的杰作”（这是我今年看到的最靠谱的一个腰封了），在小说里，作家分别描写了几个遇到不同困惑的人，他们均是普通如你我一样的庸常之人，经历生死或者心灵压抑许久之后，他们要到印度进行一次寻找心灵解脱式的旅行，在印度那浩大而深邃的恒河面前，各人的解脱和对人生的理解得到洗涤。我还想说，远藤周作的这种“实打实”的现实主义写法，在这个浮躁的时代却具有了一种深沉和厚重的力量，那种因为坦诚而对生命呈现出来的一种美感，实在是永远都不会过时。

说到是否可以得到某些“真谛”和解脱之类关于信念的问题，我始终相信，人性是丑陋的，人生应该是美好的。英国作家威廉·戈尔丁的《蝇王》就是一部讲述人性之丑的小说，作家不遗余力地要把这个我们自以为熟悉和掌握了的世界描写成一个充满恶臭和丑陋的地方，就如同前不久法国纪录片《home》所展示的一样，在人类不断地糟蹋下，地球早已经处于濒临崩溃和变态的边缘，艺术家的展示和告诫总是显得那么无足轻重，但至少总有总比没有好。戈尔丁的另外一部也非常有名、也同样是展示人性丑陋的小说《黑暗昭昭》（张和龙译，译林出版社2009年5月），显得有点沉闷或者不忍去读，因为此时的“黑暗”的场所你更熟悉，“黑暗”之人也是年纪轻轻的男孩女孩……这个夏天实在太热了，最后奉劝大家还是不要自找麻烦了。

附 戴新伟：朱兄对《废都》的看法，鄙人持保留意见：)

王晓渔：我觉得《废都》是贾平凹最好的东东。不过，贾平凹的东东我读得很少，这样说不太准确。

罗四鸽：怎么和我昨天与成庆说的一模一样，差点以为是成庆。我也认为是《废都》是贾平凹最好的小说，其次是《怀念狼》，当然我指长篇。甚至可以说可能是他们那一代人中最好的长篇小说之不一。之后，他又渐渐回到之前，把自己高高置上，开始矫情和代言。小说虽技艺成熟，却少了起初的那份天真和赤诚。

朱航满：也忍不住说几句，贾平凹的东西，觉得长篇小说《浮躁》最好，其次《高老庄》，《废都》的精神世界是一滩污泥，不管写得多么深刻和形象，但还是一滩泥，这不是优秀作品和伟大作家所要给我们的精神食粮。我始终认为，贾的散文超过小说，长篇散文超过小品文。贾很可能会成为文学史上的一个泡沫，嘿嘿。

朱白：我记得很久很久前看《五魁》那些中篇，觉得真挺好，此后再也没觉得好，至于《废都》被说成当代经典中的经典，更是我理解的不了。《高兴》，那都是什么啊，指手画脚的，跟阎连科《丁庄梦》也差不多吧，中国作家就爱体验生活，反正觉得没啥意思啊。

汪伟：《废都》不错啊。那时候我刚念中学，准备找本黄书看看，没想到一点都兴奋不起来。以那时候的眼光看，写得真是不错。多年后又看了贾80年代的一些中短篇，加上《白夜》什么的，为了比较起见，把《废都》重新找出来看一遍，还是不错，应该是贾的最高峰了吧。

苏小和：有兴趣的人去学习一下□□□（此处删去三个字——编者按）的文集，里面有贾平凹同学写给□（此处删去一个字——编者按）大官人的赞美诗。当然，马屁归马屁，《废都》的语言技术就是好，就是好，就是好啊就是好。

王晓渔：转贴一段材料，1997年4月16日，贾平凹在致中国作家协会党组书记翟泰丰的信中写道：

……在我困难的日子里，您在关心着我，帮助着我，古人讲，树有色容鸟亦知，我是知色容之恩的。但有人以此来为难您，这令我不安，惟一让我不安！这些人实在是不了解我，但有什么办法呢，只能让时间去作答复吧。

在我向您问候病情的时候，我却说了这些话，实在不妥，但又想，实话说了是中听的，我以一个年轻的朋友的身份，对您说这些心中实情，您也会高兴的，而高兴对身体是有益无害的。我不能为您做任何事情，我在此惟一能做的是向您问候，盼您早日康复！现在我在此为您唱一首“好人一生平安”的歌，让上天听到，让风能传到北京去。

贾葭：说到贾平凹，也闲扯两句。我的感觉，就内容而言，农村题材比城市题材的要好看，比如《商州》、《秦腔》与《白夜》对比。就体例而言，散文比小说好看，比如《月迹》、《黑龙口》等小文，浅白有趣，印象颇深。

LITERATURE&NONFICTION 文学·非虚构

观察员 朱航满（石家庄，zhm7976@126.com）

李洁非的著作《典型文坛》（湖北人民出版社，2008年8月1版），近五十万字，集中写文学史上曾经风流一时的人物，诸如丁玲、周扬、胡风、姚文元、老舍、赵树理，等等，虽是熟悉的历史人物，但捧书来读，却是新鲜而令人难以怀的。阅读的经验告诉我，这是近年来我读到最好的文学专著，其成功在我看来是论者剑走偏锋地重新论述了当代文学所呈现面貌的渊源与脉络。这本专著以“典型文坛”这样的视角来切入中国当代文学史，选取了十一个在当代中国文学史上曾经堪称弄潮儿的人物，他们的文学命运，兴衰起伏，悲欢际遇，恰恰从另一个侧面证明了中国当代文坛独特的生命特征，其典型的文学命运正是中国当代文坛和文学史的典型之处，这也正是论者所要交代给我们的一一半个多世纪以来的文学史，其核心的东西并非是文学的本身，而更多更重要的因素恰恰是非文学的东西在主宰着——李洁非的成功之处在于他深刻地认识到了这种内在因素。

李洁非的论述，在我看来似乎用知识分子寻找自己安身立命的文学地位，而在与历史和时代所赋予他们独特使命之间的关系来表达比较合适，这种关系在我看来无非“错位”和“越位”两个关键的词语。诸如丁玲，这位曾经叱咤风云的文学人物，其内心深处所渴望的无非是能够安静的写作，她的不断挣扎、追求、放弃甚至是自我保护，均是对于这种纯净梦想的实现；再有老舍、赵树理、郭小川等等，均无非是如此。我在阅读论者关于郭小川这位文学史上的政治抒情诗人的叙述时，产生了一种心灵上的极大震撼，因为曾在作家协会中担任秘书长职务的抒情诗人却过着双重的生活，其内在的煎熬与痛苦愈积愈深，最后竟然成为一种不合作式的消极抗拒。从这些文学人物的心灵史中，不难读出政治文化秩序建立与作家心灵深处的精神愿望之间的巨大鸿沟，而这种错位则是最终以消磨和牺牲后者的灵魂为巨大代价的。

与这种错位相对应的是知识分子的越位行为，这种越位在论者的眼中或者是历史浪潮的推波助澜，或者是文学人物的天真梦想，诸如胡风、周扬、浩然以及姚文元等等这样的典型人物，他们伴随着新的文学秩序的建立而大起大落，其文学命运远远越出了他们本身的价值。诸如胡风，这位以鲁迅为精神旗手的左翼理论家在新秩序建立之初，无非是为了证明在国统区自我革命的合法性地位，却没有看到新秩序的必然规则所在。最终的悲剧性根源在于知识分子没有看清自己在历史中的位置，他所写出洋洋洒洒的万言书在今天看来着实有着一一种令人感到荒诞和尴尬的喜剧色彩；再如姚文元，这位红极一时的投机分子，在今天看来，他走得更令人感到匪夷所思，其试图成为政治斗争的代言人形象，这早已超出了文学的范畴之内，使得他最终被政治运动利用；而周扬、浩然这样的人物，其文学命运因潮流而被动起伏，则让我想起一首流行歌曲所吟唱的那样悲凉与无奈：“漫漫前路，起浮不能由我；人海漂泊，尝尽人间冷暖”。



《典型文坛》之外，近来所读另外一个学者王彬彬的著作《文坛三户：金庸、王朔、余秋雨》（增订版）（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2月），同样显示了论者不流俗的独立批评使命。论者将矛头勇敢地对准了当代文坛上三个巨有极大争议和号召力的作家，而其论述中所面临的更大困难是与那些可能自己尊敬或者有巨大影响的学者论点的较量。尽管我个人并非完全赞同论者的所有观点，但我在他的论述之中丝毫没有看到一丝的怯懦和退避的痕迹，而是迎头出击，与自己观点相左的所有论点进行论战，这显然并非一种巧妙的方法，但同时也是一种令人尊敬的方法。之所以如此论述，是因为这本《文坛三户》其实并非一本严格意义上的论著，而是带有学术述评的意味，将所有的文坛观点进行分门别类，或认同或批评，从而表达自己的个人态度；其次是由于论者深受鲁迅的影响，其精神底色巨大强烈反抗奴役的斗争性，金庸、王朔和余秋雨之所以被选中成为批评的对象，正是在其认为这些写作的本身是试图在麻痹读者的神经，而精神本质与那些惊险猎奇、风花雪月和虚张声势的陈旧作品没有太大的差别，更重要的是作家本身的精神世界没有承担起应有的道德使命。王彬彬写作的另一个特点是思想文化意识浓厚，更多关注于文学作品的精神文化意义，但对文学本身的把握和鉴赏似欠缺，写作笔法又以杂文手法见长，大有攻其

一点不计其余的特点，因此许多论点读后深觉有失偏颇。

文学研究者转入文化思想领域是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上述李洁非、王彬彬均是如此，近来读学者谢泳的著作《**靠不住的历史：杂书过眼录二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1月），深觉纯粹的文学研究已经不能概括学者们的诉求与抱负。去岁有幸在北京一次研讨会上获赠一册谢泳所著的台湾版文集《何故乱翻书》（秀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08年2月），读后曾写成一文《前辈学人有遗风》（载《开卷》2008年12期），文章感慨学者谢泳的读书笔记文章虽短小，但能够在罕见的史料中化腐朽为神奇，给当代学术史研究开拓新的领域和空间，大有前代学人“动手动脚找材料”的遗风；其次令我大为感慨的是谢泳在文章中不经意间流露出一种做学问的宽厚与博大气象，其表现为学术资源的共享与互惠，他常常将自己收集和购买的珍贵资料赠送给有用的朋友或学术机构，真正体现出“学术乃天下之公器”的精神本色，读后深觉有前辈学人的流风遗韵。

《何故乱翻书》因是台版，估计内地一般读者难以见到，因此推荐这册《靠不住的历史》。我仔细对比了两本书的目录，大部分是相同的，倒是后者补充了谢泳的一些最新研究成果，其中关于鲁迅和钱锺书等人的研究文章就颇值得一读，也可以从中感到谢泳十分敏锐的问题意识，诸如《鲁迅研究中的“厦门叙事难题”》一文就是对于鲁迅研究的逻辑起点的质疑，其本身就是论者在对于历史史料的细心研究和“回到真实的历史处境中”的研究勇气。近年来，谢泳的著作出版频繁，以前难以出版的著作也能够频频面世，诸如《书生的困境》（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5月）、《西南联大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湖南文艺出版社，2009年5月）、《清华三才子》（东方出版社，2009年7月）等均是今年集中出版或再版面世的人文学术著作，而我倒是觉得由于论者在精神诉求上的一致性，导致了其研究存在某种主题先行的可疑，促使这些著作在丰富性上大打折扣。史料的新鲜和丰富却无法改变论点的相似形，因此诸多著作在我看来选择一两册来读即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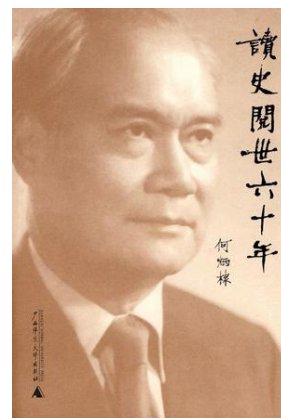
谢泳的研究从文学到思想文化研究的转折，据说与他发觉现代知识分子群体有着重要关联，并最终一个人（储安平）、一本杂志（《观察》）和一所大学（西南联合大学）的研究而引起学界的关注。关于这些研究，谢泳均有诸多很开风气的文章，但归根到最后则是他对于近现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群体的精神认同，这个群体在抗日战争时期又以西南联合大学的知识分子群体作为典型的代表。最近读了传记《**读史阅世六十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3月再版），作者何炳棣就是曾求学于西南联合大学的学生。通读这册传记，感觉论者对于学术追求十分执着，全书以自己求学和研究的心路历程作为主要脉络，而绝少提及个人的花边趣事。因此，整本书读来，颇感扎实厚重，对于了解西南联合大学一代学人的生命历程有着很重要的帮助。不过，在对此书纷纷称赞的同时，倒是也听到不少的论者对于何炳棣的回忆叙述颇不以为然，究其原因则是对作者一惊一诧的语气所不满，因其有着强烈的个人优越感和自豪感，让许多读者心中厌腻。但说实话，在我所知道的西南联合大学的学人叙述中，大多或多或少都有着如此的情绪，诸如北大许渊冲先生的《追忆逝水年华》中的自负，那真是大有学术文化界“老子天下第一”的感觉，想来这可能与他们在国家存亡之际还能坚持文化的学术薪火并终有所成有关，而这也或许才是西南联大的真精神。但对比许渊冲，读何炳棣的人生追忆就颇感到幸运，没有经受随后的政权更迭和政治运动，能够潜心学术研究并取得了十分美满的结局。许渊冲与何炳棣可以算做西南联合大学知识分子的两种不同的人生路径。



七十年代

北岛 李陀 主编

陈丹青在评述“星星”画派时有一个论点，我以为对于评价七十年代的这些觉醒者有着很重要的意义，那就是“仍然在野”。今天看来，七十年代他们早于其他人而觉醒，思想意识冲破了时代的樊篱，但也许是这种思想意识与现有意识形态



之间的巨大鸿沟，尽管今天也并非新鲜，但仍然只能成为那个时代的少数派。仍然在野——这是对于他们十分准确的评判，这种带有某种讽刺和悲剧意味又似乎带有一种清高与无奈的论断，表明了他们在今天的命运，或许最终成为我们这个时代“思想史上的失踪者”，或者只能是执着纯粹理想的精神守望者，诸如赵越胜的文章《偈歌清酒忆旧时——记七十年代我的一个朋友》，读来婉转哀伤。此文所记的就是这样一个思想的早醒者，而他的命运最后却是被时代浪潮不断地挤压、挟裹甚至遗忘，之中的沧桑与辛酸，道与谁说？读完全文，让我思考的是，这种精神上的早醒在今天是否还依然具有意义，或者说我们今日是否还依然能够成为不被蒙蔽的觉醒者，甚至可能在某一天清晨也如这些七十年代的早醒者一样回忆自己的骄傲与自豪？如果真是如此的话，有些论断似乎还下之尚早。

不过，还有一个令人注意的现象就是，这些思想上的早醒者大多本身乃是那个时代独特和极为少数的一部分，他们出身高级知识分子或上层专政阶层，这使得他们拥有了更多选择的空间，也可见，叛逆的种子必然将埋藏在最核心的堡垒之中。倒是阎连科在《我的那个年代》中关于农村知识青年的记忆值得特别的关注，他们在那个年代所渴望的更多是获取生命的保障而非个体的尊严与理想，这些曾经沉默的大多数才是我们今天这个时代的社会主体。《七十年代》中的文章最初刊发于北岛所主编的海外杂志《今天》上，然后由香港的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最后才由北京的三联书店出版，据说还做了删节和修订，看来陈丹青说“仍然在野”是多么恰当，也同时似乎也在暗暗地证明他们在努力形成一种不同的记忆，以召唤我们在今天所需要对待的精神使命。但我不知道究竟还有多少人在阅读之后，还会有这样来自心灵深处的沉思？

THOUGHT&PHILOSOPHY 思想·哲学

观察员 成庆（上海，veron.cq@gmail.com）

每去一地，我最有兴趣探访的大抵是宗教场所一类的古迹，因为这类场所常常能集中反映出时代的精神截面。假期因探亲之故在安庆城呆了10余天，于我最感好奇的是，安庆市区区区一地，居然保留了天主教的耶稣圣心主教、基督教的基督教堂、美国圣公会的救主座堂、伊斯兰教的南关清真寺以及佛教的迎江寺，可见此地的精神生活定有不同于一般城市的地方。传教士J.K.施赖奥克在1920年代写作的《近代中国人的宗教信仰——安庆的寺庙及其崇拜》（程曦译，安徽大学出版社，2008年）对此地的祖宗崇拜和佛道二教的信仰生活有详细的描述。J.K.施赖奥克1916年来华，在安庆圣保罗中学担任牧师，其活动的年代，前有1869年的安庆教案，后有1922年圣保罗中学学生的“反奴化教育”的反教会运动，可见基督教传教过程直到20世纪20年代，仍然难以顺利融入。



圣保罗中学旧址的不远处，就是1907年徐锡麟刺杀安徽巡抚恩铭的故地，此前两年（1905），安庆桐城人吴樾因刺杀五大臣而身亡，所以在安庆市中心，就有一条纪念吴樾的“吴樾街”（今改名为吴越街）。而更为人所熟知的安庆激进之士，则非陈独秀莫属。

革命话题，自然是现代政治演变的核心主题，如要追溯，法国大革命当然是开启这一重要观念的标志性事件，因此不论赞成还是反对革命，如要追溯源头，总会以法国大革命作为标杆来作分析。由威廉·多伊尔所作的《法国大革命的起源》（张弛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8月）可算是一本简明扼要的入门读物。相比起弗朗索瓦·傅勒的《思考法国大革命》（孟明译，三联书店，2005年），多伊尔的著作更侧重的是从社会因素的角度去解释大革命的发生，而傅勒却强调的是：法国大革命史的最大启发是要重新认识“政制”，即我们所常常提到的宪政制度。法国大革命作为一场历史事件，其偶然性无法预料，但是它之所以演变成一场悲剧，本身并不在于民主价值本身的问题，而在于民主本身隐藏着一些悖论性的内容，那就是如何协调作为“人民民主”的价值与作为一种保障个人权利的“宪政体制”的平衡。在傅勒看来，英国那场渐进的革命之所以显得平稳，并不在于渐进本身有何优越性，而在于它维护了贯通权力与个人之间的公民社会，让法律在这样一个结构中有效地防止国家权力直接干涉个人的自由，从而也就没有导致雅各宾式的专政。不过多伊尔却看到的是，法国政府所遭遇的财政困境，反对派的强大与改革的失败等诸多社会原因，作为检讨历史而言，我们很难说是社会原因导致一场改变人类文明的运动发生，我更倾向的看法是，民主与平等的观念正好遭遇到那样的时代情境，才迸发出如此巨大的力量，成为后世革

命风潮的标杆。

革命是令人“恐惧”的政治实践，不过对于人民而言，革命之后怎么办，恐怕将是更让人困扰的问题。对于美国法学家乔治·P·弗莱彻而言，1787年的费城宪法也远无法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他在《隐藏的宪法：林肯如何重新铸定美国宪法》（陈绪纲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7月）中提出一个有趣的看法：1787年的宪法由于南北战争而出现了危机，而正是林肯与美国民众亲眼看到战争的血腥与残酷，由此以林肯著名的“葛底斯堡演讲”为标志，新的宪法秩序正式诞生，即对美国作为一个民族国家的重新界定。

有必要提醒各位读者的是，这本严肃的法律研究著作的译者后记却让人感觉“极不严肃”，他不仅暴露出想把书名改作《躲猫猫的宪法》的闪念，而且还用了“屎”之类的“极不书面”的语言来对时事进行臧否，我很容易理解译者的心情，因为他开篇就面对林肯在葛底斯堡演讲：“八十七年前，我们的先辈在这块大陆上，缔造了一个崭新的国家。她孕育于自由之中，奉行人人人生而平等的原则”，译事至此，译者自然感到无比的沮丧。

最后要重点推荐的一本书是谢尔登·S·沃林的《政治与构想：西方政治思想的延续和创新》（辛亨复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7月），得知此书，是因台湾政治思想史学者钱永祥先生的推介，不过笔者懒惰，后虽得到该书的英文本，却慨叹其煌煌巨著，未能尽读。尽管今日笔者个人并不能认同沃林对政治哲学的某些基本界定，但是作为影响美国政治哲学几代人的著作，理应得到各位的重视。沃林在增补版中提出了一个新的看法，即认为今日美国进入了一个“颠倒的极权主义”状态中，他的理由是，今天的美国民主由于现代技术与资本的结合使得政治革命的力量反而被削弱，国家拥有更大规模的力量，而反对力量却在多元化的趋势中不断地分解。不过，对于这样的“美国左派”言论，我们切莫天真地认为，彼岸的压迫可以不加分辨地移植于此岸。



HISTORY&CULTURE 文史

观察员 王晓渔（上海，wxy1978@hotmail.com）

8月，上海书展。我目标明确，不看新书，只看打折区域，3折购得一套黎东方等撰写的“细说中国历史丛书”（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2002年），原价220.30元，打折后66.1元。这套丛书属于细水长流的类型，不断重印，但称不上火爆，经过十年时间，直至2007年以“黎东方讲史”为名再版，才在媒体上掀起小小的热潮。“细说”不敌“戏说”，这是可以预料的，不足为奇。新版定价280元，价格略涨，符合物价上涨指数，但是装帧不是我喜欢的风格，所以我一直按兵不动，慢慢搜集先前的版本，没想到此次一网打尽。

新版封面称黎东方是“中国卖票讲史第一人”，是否“第一人”有待考证，当年盛况却是难以再现。据黎东方自述，1944年，他在陪都重庆连讲十天三国，收入相当于他几十个月的教授薪水。后来，他在泸州、昆明、南京、贵阳、安顺等讲史，曾用九百六十张讲演票的收入支付了一架从贵阳到香港的小飞机包机费用。今日，易中天、于丹演讲基本是邀请单位买单，郭德刚、周立波的观众虽然是自费，所讲内容却深度有限，把他们捆绑在一起，或可与黎东方相比。

“细说中国历史丛书”一套9册，其中5.5本是黎东方原创，《细说三国》、《细说元朝》、《细说明朝》、《细说清朝》、《细说民国创立》，还有0.5本是《细说秦汉》，黎东方留有残稿，由其他学者整理补编，《细说两晋南北朝》、《细说隋唐》、《细说宋朝》由出版社邀请专家补齐。这里不谈被细说和戏说了无数遍的《细说三国》，只以《细说清朝》里的近代史部分为例。讲到洋枪队时，提到几个细节，队长华尔临死之前留下遗嘱，要求将清朝官员和商人许诺的十四万两银子留给亲属，谁知这个白条直至三四十年后才在《辛丑条约》中兑现。继任长官戈登作为保证人，参加清军和苏州太平军的谈判，保证清军不杀降兵，但最后清军背信杀降，戈登大怒，一度想重夺苏州，交还给太平军，这个情节2007年由于电影《投名状》而为公众熟悉。讲到义和团，黎东方提及义和团火烧西药房，火势蔓延四千多家店家与住宅，民间救火组织“水会”想去救火，被义和团阻止，清朝的正规军也趁火打劫，以光绪名义宣战的诏书，宣战对象竟然不是某一国或者某几国，而是具

有天朝特色的“远人”，等于向全世界宣战。黎东方对这段历史的态度，如同蒋廷黻的《中国近代史》，反思大于控诉，尽力避免“悲情叙事”。关于近代史，中国有着太多的悲伤往事，诉苦几乎是第一反应，但是仅仅将责任归咎于他者（帝国主义或者“投降派”），拒绝承认自己的失败，拒绝自我反思，他者不会因为控诉而改变，自己亦无长进，最终只能导致历史不断重演。

关于历史，我喜欢读研究著作或者一手资料，很少细读介于两者之间的普及读物，毕竟黎东方只有一个。无论久负盛名的《上下五千年》，还是新出茅庐的《明朝那些事儿》、《帝国政界往事》等，我都不感兴趣。易中天像《读者》、于丹像《知音》，这些书更像《故事会》，与历史没有什么关系。



黄山书社的“传记文学丛书”取材台湾《传记文学》杂志，《传记文学》在史学界享有盛誉，被称作“民国史长城”，新近引入的《浦薛凤回忆录》（黄山书社，2009年6月）就保留了现代学术史的大量一手资料。浦薛凤先生在大陆几乎没有任何名声，他的《西洋现代政治思潮》（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重新出版之后也没有什么动静。浦薛凤早年就读于清华园，后来赴美国哈佛大学等留学，回国后先后在清华大学、西南联合大学执教，随后从政，后来去台湾，身兼政学两界，晚年在台湾执教，曾应王云五之邀回台担任商务印书馆总编辑，见证了20世纪中国的学术史。

《浦薛凤回忆录》分为三册，上册《万里家山一梦中》主要讲求学和战前的执教生涯，中册《太虚空里一游尘》主要讲抗战生涯，下册《相见时难别亦难》主要讲战后在台、美两地生涯。浦薛凤是清华辛酉级学生，这一级级友阵容强大，有罗隆基、闻一多、吴国桢（上海市市长）、吴泽霖（社会学家，清华大学人类学系主任）、萨本栋（物理学家，厦门大学校长）、杨廷宝（建筑学家，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潘光旦（社会学家，西南联合大学教务长）等。可惜关于辛酉级的一手资料并不多见，浦薛凤的回忆成为重要参考资料。他详细讲述了辛酉级级友因为罢课问题产生的分裂，还清晰地勾勒了大学生活。当年的清华鼓励集会结社，注重程序训练，中等科时就有“议事规则”一课，详述民主社会公正议事规则。在欧美诸国视为常识的罗伯特《议事规则》直至1995年才译成中文，这两年在孙涤等先生的推动下逐渐获得关注。清华的教育在今天看来依然领时代风气，当年清华校友游走于政学两界，不是简单的“学而优则仕”，也不是“工程师治国”，而是得益于清华园中的民主训练。浦薛凤回忆国防最高委员会参事室，注意到同仁“几全系教授出身，尤以清华教授为多”，但是并未因此形成门派。由此观之，后来大陆多位著名右派（罗隆基、吴泽霖、潘光旦、吴文藻等）以及台湾两大事件（吴国桢和孙立人）的当事人均是清华校友，绝非偶然。书中虽然免不了回忆录常有的自许，但是与他的两位清华学弟何炳棣、许渊冲相比，要节制许多。何炳棣的《读史阅世六十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和许渊冲的《追忆似水年华》（三联书店，1996年）虽然同样提供了学术史的一手资料，但是自我表扬得让旁观者看来都有些脸红。

自我神话和悲情叙事是两面一体的。反对悲情叙事，不等于拒绝回忆痛苦。可是我们要么“忆苦思甜”，要么只“思甜”不“忆苦”，唯独难以冷静“忆苦”。在多得有些泛滥的回顾历史的著作中，潘永修、郑玉琢主编的《三年困难纪事》（中国工人出版社，2009年3月）起到“填补空白”的作用。“填补空白”如今已经成为一句套话，绝大多数“填补空白”的著作只是历史涂鸦，《三年困难纪事》却担当得起这种盛赞。其中虽然不乏“忆苦思甜”的文章，可是对于这本著作的出版，无论如何要抱有敬意。一段不能忘却的历史，本来应由国家全力整理搜集资料，这对夫妇却以一己之力自费刊登征文启事并且寻求出版，再次印证了“学在民间”的说法。最让我感到遗憾的是，限于篇幅，书中只收入了征文的极少一部分，盼望作者能够悉心保存所有征文手稿。

另一本以个人之力编撰的“民间国语”是《真话：1978-2008中国壮语》（九州出版社，2009年8月）。我最初是在天涯虚拟社区的“闲闲书话”版块看到编著者刘青松贴出部分片段，决定购买此书。否则，我很有可能会与此书擦肩而过，因为我既不喜欢“真话”一词，这容易让我联想起奥威尔《一九八四》里的“真理”，也不喜欢“壮语”一词，我对豪言壮语一向敬而远之。

《真话：1978-2008中国壮语》编选了三十年间公开出版物上的各种言论，编著者刘青松不是简单地复制粘帖，而是



仔细交代了每一句话的背景，并且将相似的言论整理在一起，唤起了话语的集体效应。这种类型的著作我们并不陌生，最初是以“语录体”的方式出现，象征着权威；后来盛行的是“格言体”，更加贴近读者的世俗生活。从余世存编著的《非常道：1840-1999 的中国话语》（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 年）开始，“世说新语体”成为潮流，从微观叙事入手，关涉的是公共生活。《非常道：1840-1999 的中国话语》出版之后，山寨版大概有十余种，可是大多形似而神不似，《真话：1978-2008 中国壮语》显然也是模仿之作，却有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之处。它的主要目的不是展现说话者的风采，而是通过那些言论呈现时代的踪迹，从这一点来说，我把它称作“民间国语”。1982 年，人民音乐出版社出版《怎样鉴别黄色歌曲》，称：“黄色歌曲的特点是：音乐上，大量采用软化，动荡，带有诱惑性的节奏；旋律多采用叙述性与歌唱性相结合的写法；配写比较细致的伴奏。”1991 年，崔健在《一块红布》里唱道：“那天是你用一块红布，蒙住我双眼也蒙住了天。你问我看见了什么，我说我看见了幸福。”一向被视为玩世不恭的王朔这样评价：“我第一次听《一块红布》都快哭了，写得透！当时我感觉我们千言万语写得都不如他这三言两语的词儿。”2006 年，一首《香水有毒》传唱大江南北：“你身上有她的香水味/是我鼻子犯的罪/不该嗅到她的美/擦掉一切陪你睡。”看着这些曾经熟悉但是一度遗忘的语句，三十年的历史瞬间再现。《真话：1978-2008 中国壮语》告诉我们，可以以一种喜剧的眼光看待历史，这不是“忆苦思甜”，而是一种反讽式的观察。或许，反讽是走出悲情叙事的前奏。

阅读报告·台港海外

AMERICA 美利坚

沉默还是抗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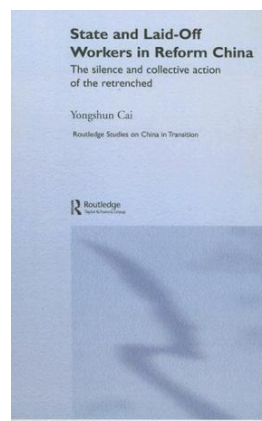
曹开雄 （上海，ckx1123@126.com）

所有的社会科学家一定为能目睹中国的改革而兴奋不已，它总是不断的为社会科学研究提供难得的经验材料和意外的理论发现，正如蔡永顺在他的 *State and Laid-Off Workers in Reform China: The Silence and Collective Action of the Retrenched* 中向我们展示的。当人们远观中国的经济改革成就时，耀眼的光芒总是不经意的遮蔽了被改革大潮裹挟而去的种种不幸，而这其中，下岗工人这一特殊时期的特殊群体的历史值得我们持久的研究和记忆。

每一场深刻的变革都必定要牺牲部分社会群体的利益。工人，这个在社会主义中国有着特殊记忆的群体面临了一场对他们而言更是前所未有的大动荡。当他们从享有无上荣耀的社会主人的地位跌落到为生而挣扎的窘境时，我们却奇怪地发现，他们并没有群起而反抗，虽然在 500 万之下岗工人中不乏激烈的集体抗争，而且往往抗争带来了比起沉默更大的利益补偿，但是他们中大多数的沉默，使得经济改革顺利地继续前行。

在一个缺乏独立社会组织的威权国家中，社会运动的产生往往更加依赖于广大群体中共享的动机。斯坦福大学的周雪光在他早期的一篇文章中提出，中国改革后前苏联共产主义模式的崩溃塑造了大量具有共同体体验的心怀愤懑的工人，而又因为他们长期一同工作下的国企，形成了一种无形的非正式社会网络，使非组织化的社会抗争成为可能。的确，改革前中国工人所有的个人福利完全依赖于单位提供，国家在此之外没有建设任何社会保障的体系，下岗对工人来说意味着生存道义上的极大考验，各种不满甚至对体制的憎恨理应成为一种极强的可以在工人中分享的情绪，但是这种强烈的剥夺感为什么没有导致大规模的抗争？蔡永顺沿着工人之间的互动，以及工人与国家间的互动这两条线索解释了工人的沉默与抗争。他的核心观点是工人内部的分化以及国家改革的政策模式所带来的集体抗争的代价造就了沉默的大多数；同时中国的威权体制中固有的政治机会又使一定程度的集体抗争成为可能。

分化（fragmentation）始终是集体行动中的一个重要障碍，尽管中国的下岗工人有着惊人相似的身份认同，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是一个无懈可击的整体。通过回归分析蔡永顺得出中国工人的抗争与否主要在于对行动效果的信心和对行动



代价的感知，而并非仅仅来自于广泛的不满。而恰恰是工人们对于这种行动的信心和代价感知产生了严重的分化，于是塑造了多数工人的沉默。答案可以分别从上述的两条线索中的互动中找到。从工人间的互动来看，上世纪 90 年代初到本世纪初，国有企业改革和下岗的过程整整持续了十年有余，工人的下岗有先有后，企业的规模和财政状况上下有别，有技术的工人可以谋取第二职业，社会人脉较广的通过关系找到了下岗的后路，处境较好的大型国企暂无下岗之虞，而不同年龄，不同性别，不同学历的工人也面对不同的再就业机会。总之不同的工人拥有不同的境遇和寻求再就业的出路，参与集体抗争意味着工人们要计算不同的机会成本。再来看国家采取的应对模式，当时对于国企改制的主导思路是“抓大放小”，这就意味着不同企业的工人是在不同的时段面临下岗问题，而且国家将最难啃的大企业这根骨头留在了最后；在下岗的方式上，有同时下岗和分批下岗两种模式，蔡发现，同时下岗的比起分批下岗更容易引起集体抗争，原因在于同时下岗容易引起更大规模的不满，并且往往将可能成为潜在组织者的中层干部牵连在内。但财政状况稍好的大企业往往采用的是分批下岗，由此也避免的大规模的集体抗争；另外国家同时采取了选择性的压制和妥协，压制的对象无疑就是集体抗争中起的组织者，因为在没有自主社会组织的中国组织者在集体抗争中的作用就显得尤为关键，压制的同时也必定伴随一定程度的妥协。

在威权国家和分化的工人面前，抗争又如何可能呢？在工人间的互动中，蔡强调了工人中出现组织者的重要性，并且注意到了微观生存环境在工人集体行动中的动员作用。赵鼎新就曾经关注过北京的大学聚集区——这一特殊的非正式社会网络——对于学生运动的促进作用。蔡认为尽管组织者受到政府和企业严密的控制，但出于个人利益，工人社群中的非正式关系的压力，甚至是纯粹的正义感，还是出现了一些集体抗争的组织者。另外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大型国企往往有能力提供职工福利分房的待遇，而正是这些集中生活在某一区域的工人，往往形成了有利于信息传播和较大规模集体抗争的条件。在工人与国家的互动中，蔡运用了政治机会的分析。上世纪 80 年代后对于政治机会结构的关注盛行于社会运动研究中，正是政治机会结构这一概念将国家结构及其行为与社会抗争联系在一起。中国的同样存在的有利于集体抗争的政治机会，然后它并不是来自于有如前苏联和台湾的政治体制的变革，而是寄存于中国的威权体制本身中。一方面威权的存续需要大众对政权合法性的认可，不加节制的运用暴力机器必然带来巨大的统治成本；另一方面中国自上而下的央地政府间的权责关系也给与集体抗争以空间。维稳始终是地方政府政治责任中的重中之重，央地政府的共同目标仅限于禁止一切有损政权权威的政治性挑战，于是工人们争取纯粹利益诉求的非暴力的集体抗争成为可能。

当作为社会力量中极具政治影响力的工人集体的抗争被威权国家消解的时候，是不是注定国家的继续扩张和社会的持续沉默呢？蔡不这样认为，虽然下岗工人们没能形成大规模的社会抗争，但是零星的小规模的抗争仍然给国家以统治合法性的压力，之后国家也确实采取了一系列的制度上的调整。因此，社会抗争的价值就在于它是塑造国家和社会间互动的一个重要力量，蒂利对于民主化的开创性的理解就基于社会抗争与国家间的互动（可参见《欧洲的抗争与民主》、《民主》）。谢岳在《社会抗争与民主化》一书中也强调了社会抗争的积极作用，认为结构性的条件和社会抗争共同推进了民主化的进程。然而正如中国的国家权力的国企改革中的表现一样，威权政权往往又具有某种弹性，它能够吸收一定程度的社会表达，并不至于马上遇到亨廷顿在《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所提出的社会的广泛动员和体制缺乏表达渠道间的巨大挑战。然而社会力量一旦觉醒，就将是一股不可逆的力量，威权体制的弹性也必定有它的边界，我们欣喜的是当下中国，为争取社会权利和话语的社会抗争持续存在并充满了创造力，威权政体与社会抗争的互动，中国注定让人充满期待。

Yongshun CAI: *State and Laid-Off Workers in Reform China: The Silence and Collective Action of the Retrenched*,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Press, 2006, US\$120.

ENGLAND 英格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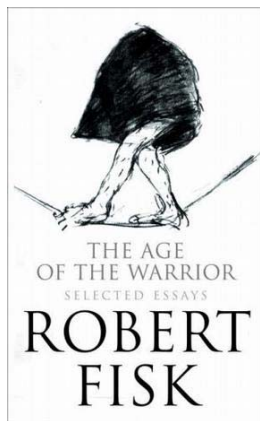
勇士的年代

特约撰稿人 孙骁骥（北京，seismometer2006@yahoo.com.cn）

一个以“反对什么”来界定自己身份的人是危险的，尤其当他恰好是个记者的时候。所幸，罗伯特·费斯克并不会被

划归入此类，虽然他是为数不多的敢直接与 BBC 和我们眼中的“西方”媒体公开唱反调的英国记者之一。这种“顶风作案”的个性，可以从他在《独立报》上的一系列专栏题目看出：《你怎么能相信懦夫般的 BBC？》、《民主带不来自由》、《他们怎么如此憎恨西方？》……

这样的文章不胜其数。倒不是说费斯克与 BBC 有什么血海深仇，费斯克对 BBC 不满之处，在于这所被冠以“国家”之名的广播公司，在新闻报道上实在是不够独立，有时甚至显得很窝囊。每当 BBC 电视新闻又在播送中东地区的冲突与政治新闻时，费斯克的心里其实比谁都清楚，这些新闻中的哪句话是真的，哪句话纯属是出于其他需要的杜撰。



“英国最伟大的国际新闻记者”。这样形容费斯克，其实并不夸张。作为一位常驻贝鲁特长达 30 多年的记者，中东地区的重要国际新闻他几乎写了个遍，从 1979 年的伊朗革命、苏联入侵阿富汗、两伊战争，到 2003 年的伊拉克战争，所有这些事件都是费斯克做的第一手报道。在塔利班被美国官方宣布为恐怖组织之前，他曾经先后三次采访了奥萨马·本拉登，这样经历除了美国知名记者彼得·阿内特，全世界再也找不出第二人。

试想一位记者若拥有费斯克的经历，恐怕他早就盘算着卸甲归田，开开讲座、出出回忆录，靠着前半辈子积攒下的老本养活后半辈子。不过，费斯克若是如此“短视”，也许根本成就不了今天的他了。在读过他的新书《勇士的年代》（The Age of the Warrior）之后，我更加确信，这位白发苍苍的记者从来没有，而且永远也不可能停止他那勇士般的“战斗”。此外，费斯克还通过自己的经历让我们知道，作为一个有责任感的记者，他“说真话”的勇气来自于何处。

当然，如果费斯克在书中忽悠人们说自己的新闻理想多么崇高、对新闻的追求多么孜孜不倦，我会毫不犹豫地要把这本书直接扔进垃圾筒。那些老是旧调重弹的新闻教材和手册已经够泛滥了，有任何一个记者从中获益吗？还是费斯克的自述最为直接：我成为记者就是因为自己当初想去冒险。他回忆说，他的曾祖父就是一位冒险者，曾在英国皇家海军效力，祖父爱德华·费斯克更具传奇色彩——是著名的卡迪萨克号帆船上的水手，在海上与飓风恶浪搏斗，而他的父亲比尔·费斯克还直接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

年轻时，费斯克有点感觉生不逢时，为何所有的大事儿自己偏偏都没赶上，像父辈那样成为“勇士”的希望对他来说基本落空了。但成为记者的想法，让从小喜欢历史和政治学的他看到了在新闻领域实现这一目标的可能性。自 70 年代末以来，费斯克一直是《泰晤士报》和《独立报》的特派中东地区的记者，在枪林弹雨中为西方的观众进行着新闻报道。在世界上最危险的区域做了三十年报道之后，如今的费斯克却放弃了当初自己成为“勇士”的理想。为什么？因为他发现，在新闻领域，如何不成为一个“蠢货”比如何成为一个“勇士”更重要。

费斯克把那些被媒体愚弄而不自知的人统统定义“蠢货”，他有些愤慨地说：“有时我甚至觉得我们希望自己被媒体愚弄。”在费斯克看来，能否做一位合格的记者与内心那点“英雄主义”情结根本不挨边。这个观点，他和美国记者塞缪尔·弗里德曼几乎不谋而合。一次，在弗里德曼的新闻写作班上，一位学生居然径直问他，自己能否逃课去听一位名叫哈勃斯塔姆的战地记者的讲座，弗里德曼告诉他：“就算你去听哈勃斯塔姆的讲座，你也绝不可能成为哈勃斯塔姆。”

弗里德曼的意思是，记者对于新闻的判断需要一种建立在专业训练基础上的能力。缺乏这个前提，任何对新闻表面上的热忱都无异于粉丝们盲目地对所谓战地记者、知名记者的“追星”。费斯克这个老牌战地记者，为弗里德曼的话做了自己的补充：如果盲目地相信主流媒体的“正义”立场，赋予自己的工作过多的使命感，最后记者的下场很可能成为某种主流意见的应声虫。他在多个场合都质问过自己职业的合理性，“我们真的需要战争吗？我们像需要空气、爱、孩子和安全一样需要战争吗？”

没有战争就没有战地记者，费斯克对此当然很清楚。但英国媒体对待中东地区的伊斯兰国家的偏见态度，实在没法让他从自己这份工作中找到太多的荣誉感。同样性质的事件，通常会被记者们描述成两样。他举例说，当美国大兵虐待伊拉克囚犯的新闻曝光时，媒体通常会用程度较轻的“虐待”（abuse）而避免“刑讯”（torture）这个敏感的字眼，而当遇到巴勒斯坦士兵杀死以色列人时，不分青红皂白，出现在西方报纸的一律都是“暗杀”这个词。

这只是报纸中一个最为平常的例子，看似琐碎不足道，但设想一下当每天出现在电视、报纸、网络上的新闻都是采取这个调调的时候，会产生什么样的效果。观众们会自然而然地认为自己的国家和盟友在中东进行着一场正义的战争，对手是恶名昭著的恐怖分子。每周七天，“恐怖分子”这个词天天都是欧美新闻出现频率排行榜的第一名。

从莎士比亚的戏剧到如今的好莱坞大片，欧洲人已经习惯把战争看作有善恶双方的惊险故事，剧情总是“好人”和“坏

蛋”相对垒。当事件的故事性逐渐代替了新闻性时，如何编辑就显得格外重要了。费斯克有一篇文章谈到自己上世纪 80 年代被派往阿富汗报道战事时遭遇了前苏联更为严格的媒体封锁情况。当他向当时所供职的报纸主编诉苦时，得到的回答却是：“我们不能仅仅因为不能派记者前往而让关于阿富汗的消息从报纸上消失”。言下之意说，即使缺乏事实，我们在故事上也可以做做文章。

但实际上，“在战争中，所有的人都是坏人”，费斯克说。这早已不是一个由勇士、利剑和英雄主义构成的浪漫年代。在偷盗、走私横行的伊拉克和巴勒斯坦，反政府武装的形象固然不怎么样，但不断传出枪杀平民丑闻的美军士兵们又有半点像是故事的“正面角色”吗？费斯克自己计算过双方的伤亡人数，一名战死的美国士兵背后至少牵连了一千名伊拉克人的生命，不过，血淋淋的数据却总是遭到官方的否认。“否认这些罪恶的数据已经成为了我们在伊拉克等国的流行病”。或许，任何一位渴望成为勇士的人在这个不再需要勇士的时代，都会不幸染上这种病。

Robert Fisk: *The Age of the Warrior*, Harper Perennial, 2009, UK£9.99.

BOOKLIST 书单

羽良

已读：

王亚志：《1950 彭德怀军事参谋的回忆：1950 年代中苏军事关系见证》，沈志华、李丹慧整理，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 年 7 月，26 元。

待读：

[美]查尔斯·蒂利：《民主》，魏洪钟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 年 6 月，29 元；

[美]罗伯特·达尔：《民主理论的前言》（扩充版），顾昕译，东方出版社，2009 年 7 月，25 元；

伍修权：《伍修权回忆录》，中国青年出版社，2009 年 7 月，38 元；

书云：《西藏一年》，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9 年 6 月，28 元。

刘柠

待读：

[俄]菲·博布科夫：《克格勃与政权——克格勃第一副主席的回忆》，王仲宣译，东方出版社，2008 年 11 月，26 元；

北岛、李陀主编：《七十年代》，三联书店，2009 年 7 月，42 元；

[法]安吉·大卫：《多米尼克·奥利——藏在〈O 的故事〉中的女人》，袁筱一译，新星出版社，2009 年 5 月，45 元；

王尧：《一个人的八十年代》，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年 3 月，28 元；

[日]东野圭吾：《宿命》，张智渊译，南海出版公司，2009 年 4 月，25 元。

成庆

在读：

[英]莱辛：《特别的猫》，彭倩文译，浙江文艺出版社，2008 年 3 月，28 元；

Maurice Friedman: *Encounter on the Narrow Ridge: A Life of Martin Buber*, Paragon House Publishers, 1993.

待读：

北岛、李陀主编：《七十年代》，三联书店，2009 年 7 月，42 元。



汪伟

在读:

[美]沃尔特·李普曼:《公众舆论》,阎克文、江红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4月,28元;

黄仁宇:《从大历史的角度度蒋介石日记》,九州出版社,2008年1月,38元;

丁学良:《液体的回忆——水、泪、血、酒中的三次革命回忆录》,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4年6月,NT\$ 250元;

杨腓力:《无语问上帝》,白陈毓华译,新世界出版社,2009年4月,26元。

待读:

方诗铭 编著:《中国历史纪年表》,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3月,12元;

张朋园:《中国民主政治的困境 1909-1949:晚清以来历届议会选举述论》,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8年1月,40元;

李南央编注:《父母昨日书(1938-1949)——李锐、范元甄通信集》,广东人民出版社,2008年12月,98元。



贾葭

重读:

李泽厚:《论语今读》,三联书店,2004年3月,38.6元。

已读:

杨继绳:《墓碑》,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2008年5月,HK\$210;

马连龙:《历届达赖喇嘛与中央政府关系》,青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1月,50元。

在读:

张朋园:《中国民主政治的困境 1909-1949:晚清以来历届议会选举述论》,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8年1月,40元;

钱端升等:《民国政制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8月,85元;

严泉:《失败的遗产:中华首届国会制宪 1913-1923》,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1月,34元。



戴新伟

在读:

董桥:《董桥作品集》(六卷),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0年4月;

俞星伟:《故泥斋杂缀》,自印本,2003年;

梁秉钧:《变化的边界》,澳门,2008年。

待读:

董桥:《董桥文集》(一、二),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08年7月;

[美]比尔·布赖森 “俏胡子逛世界”三种:《哈!小不列颠》、《欧洲在发酵》、《一脚踩进小美国》,张琰、彭倩文、张慧英译,海天出版社,2002年1月,18元、18元、18元。(孙骁骥注:比尔·布莱森这几本,如今的英文版充斥书店,可能是在小岛印量过多,需要开拓远东市场。)

象丑牛:《太仆寺逸草》,著,内蒙古教育出版社,2008年11月,25元。

闻人悦阅:《小中尉》,福建教育出版社,2009年4月,25元。



[日]茂吕美耶:《字解日本:食、衣、住、游》,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5月,39元。

孙晓骥

待读:

[意]乔万尼·阿吉里:《亚当·斯密在北京:21世纪的谱系》,路爱国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6月,39元;

Philip Roth: *Rortnoy's complaint*, Vintage, 1999 (孙晓骥注:7英镑的书在中关村只卖30RMB,中国硅谷就是有优越性);

唐鲁孙:《老古董》,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5月,22元。

言一

已读:

[日]东野圭吾:《恶意》,娄美莲译,南海出版公司,2009年5月,18元;

[美]劳伦斯·布洛克:《在死亡之中》,黄文君译,新星出版社,2006年11月,22元。

在读:

[美]雅克·巴尔赞:《我们应有的文化》,严忠志、马驭骅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09年6月,30元;

[美]柯林斯:《互动仪式链》,林聚任等译,商务印书馆,2009年4月,35元;

[南非]J.M.库切:《耻》,张冲、郭整风译,译林出版社,16.8元(言一注:根据这部小说改编的电影也出来了,打算一起看);

[俄]米罗诺夫:《俄国社会史:个性、民主家庭、公民社会及法制国家的形成》(上下卷),张广翔等译,山东大学出版社,2006年1月,160元(言一注:五折买的);

待读:

[日]远藤周作:《深河》,林水福译,南海出版公司,2009年7月,22元;

[英]萨尔曼·拉什迪:《羞耻》,黄灿然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5月,28元;

[挪威]彼得·拉森《电影音乐》,聂新兰、王文斌译,山东画报出版社,2009年7月,25元。

朱白

在读:

[美]布考斯基:《镇上最美丽的女人》,巫土译,台北:圆神出版社有限公司,2003年6月,NT\$260.00元;

[美]布考斯基:《常态的疯狂》,巫土译,台北:圆神出版社有限公司,2004年12月,NT\$260.00元。

待读:

[日]田中真澄:《小津安二郎周游》,周以量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5月,35.00元;

戴晴:《在如来佛掌中》,翻印,2009年,40.00元。

王晓渔

重读:

张朋园:《中国民主政治的困境 1909-1949:晚清以来历届议会选举述论》,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8年1月,40元。



已读：

徐成淼：《我的复旦四年》，大象出版社，2005年4月，26.3元；

[英]伊恩·麦克尤恩：《水泥花园》，冯涛译，2007年6月，22元；

[俄]扎米亚京：《我们》，殷杲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10月，18元。

在读：

钱端升等：《民国政制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8月，85元；

严泉：《失败的遗产：中华首届国会制宪 1913-1923》，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1月，34元。

待读：

[美]卡尔文：《美国的言论自由》，李忠、韩君译，三联书店，2009年6月，65元。

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人民出版社，2009年5月，48.5元。

[尼日利亚]钦努阿·阿契贝：《荒原蚁丘》，朱世达译，重庆出版社，2009年6月，26元。



BOOK REVIEW 书评

科塔萨尔的伟大是评论家封的

观察员 朱白（广州，zhubai@tom.com）

在欧洲接受洗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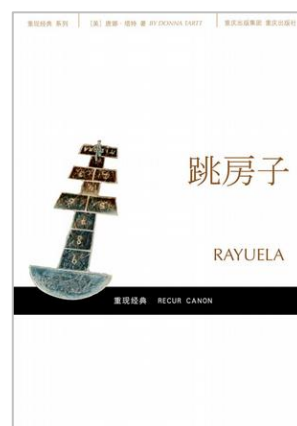
我在看《科塔萨尔论科塔萨尔》这本书里的那些对作家的采访和他自己论述性的文字时，一点没想到这位号称“拉美文学爆炸四大主将之一”的胡里奥·科塔萨尔竟是一位出身卑微、少年贫瘠、青年困顿的人，我以为他至少应该会像奈保尔那样拥有一个可以去欧洲留学的家境。

可实际上，科塔萨尔欧洲是去了，但他去的方式并非留学，而是流亡。在欧洲刚开始科塔萨尔过的并不如意，用脚趾头想一下就知道，这么一个南美洲来的青年，就如同我们今天在北京、广州这样的大城市随处见到一个外地来的中专毕业生，有人正眼看他那是见怪呢。对作家来说，难说扭曲的遭遇就是件坏事，他的艰辛都在后来文字和思想中有所体现，反过来科

塔萨尔的很多作品也会影响到他的生存境遇，作家与作品的相互影响、相互异化，这已经不是什么特例了。

跟很多南美洲的伟大人物一样，科塔萨尔并没有完全依附或者从属于欧洲的文化，当然还有欧洲的政治，他深深地厌恶资本主义。但是有人还因为他在年轻的时候读过《我的大学》，并深受影响，就将科塔萨尔定义为“左派作家”，我觉得这样说很不靠谱，但凡跟伟大扯上关系的艺术家绝对都是超越政治的。还有，科塔萨尔其实也并没有多么厌恶他所的巴黎、资本主义，至少在他的最为著名的《跳房子》里就有巴黎这座城市的一席之地。从本质上来讲，一个作家的厌恶有时候并非如他所说的那样值得你我也去厌恶，比如说马尔克斯在采访中总是在提及《百年孤独》的时候说百般嘲讽，“自打这本书印刷出来，我就没再看过它一眼”，这样的话只能是作家的一种聪明俏皮的说法，如果你真相信这本给他带来一切的书真如作家本人说的那么糟，那只能说明你没读过马尔克斯的任何作品。

在欧洲的南美洲人，一头扎进了技术的漩涡，这对于科塔萨尔来说有着先天和后天的双重作用力。在小说结构这种文学技术性的领域内，科塔萨尔的《跳房子》绝对是世界小说史上无法忽略的一部作品。他用三个部分[分别是“在那边”（巴



黎)，“在这边”(布宜诺斯艾利斯)和“其他地方”(可以忽略的章节)三个不同的内容]，来指导读者使用不同的方式来阅读这部作品，这种互动和迫使读者产生参与感可以说是科塔萨尔的一种卓越的发明和独特的创新。科塔萨尔对小说技巧的追逐，很容易让人看出他对艺术形式这种东西是那种主动的、进攻的姿势，这跟库切、奈保尔等同样从落后的地区来到欧洲的作家不同的是，科塔萨尔好像不允许自己浪费时间，他要做的就是急速地爆发，用最简单的方式为自己赢得喘气乃至超越所有人的机会。相比来讲，库切和奈保尔显然是那种更能沉得住气的作家，他们的技术“压抑”在他们的思想和灵魂之下，或者说正是这种技术被动于灵魂的写作方式，使得他们会拥有更广泛和深刻的共鸣，这也使得他们头上的伟大似乎来的更扎实些。

跟南美的其他作家不大一样，科塔萨尔既没有马尔克斯那样嚣张和大气，也没有博尔赫斯那样执拗和渊博，他更多的是表现出来的严谨和谦逊。这倒像个批评家。他确实写过大量的文论和理论性文字，在这一点上科塔萨尔和近年来那些进入人们视线的欧美一流大家一样，他们都是不但从事小说写作，也在理论上有自己的独到见解。当然，科塔萨尔能够传世并不是因为《拉丁美洲的现实与文学》这样的论文，而是《跳房子》这样的巨制，还有《南方高速》、《会和》、《万火归一》、《另一片天空》这样的足以成为教科书的短篇小说。

技术、智慧、心气，样样不缺

我觉得胡里奥·科塔萨尔是那种以聪明为基础，掌握了小说创作全部秘密的作家。他那些恢宏并带有野心的巨著和灵气四溢并可以将自己的智力完美地展现给他的读者的短篇小说以及论述性文字（在《科塔萨尔论科塔萨尔》一书中，看那些科塔萨尔的访谈，你会觉得他或许是把自己作品阐释得最好的作家了），足以说明了科塔萨尔在文学这件事上的智慧和全面性。但问题往往都存在两面性，在我看来，我们今天能够如此充满诚意地阅读和真心实意地赞美这位已经死了二十多年的作家，主要就是因为他的聪明和全面，但是从个人阅读体会来说，他没能成为我心目中的比如马克斯·库切那一类绝顶的作家，也同样是因为他的聪明和全面，此时聪明也许会成为它的反义词，全面也可能会成为另外一种片面。

以我的鼠目寸光来看，科塔萨尔的短篇小说并不适合给以看故事、打动情感为首要的普通读者看，如果你是一个对“小说”这两个字本身没什么想法的人，可能会觉得乏味和枯燥。当然，这不是说科塔萨尔的出众只是因为他是为专家和专业读者《万火归一》被认为是科塔萨尔最具才华的一部短篇小说集，你看他在里面所展现的技巧和全面的叙事才能就知道了，这一定是一个要许多作家来当楷模和用来学习的作家。他可以在《南方高速》中毫不吝惜地展示自己在多角度、多人物方面的叙事才华，众多出场人物竟然在一个环境里达到了惊人的统一性，他们的语言、行为以及方式，没有分崩离析各自为政，而是不动声色地在同一个方向上做着同样的努力。当然，你可以说这是因为他们存在于一个巨大的、强力气场的环境之中（即高速公路连续塞车的环境中），只能放下个人的身份和标签，也可以说这种环境存在是众人在故事里达到完美和谐的首要条件。但，别忘了，科塔萨尔笔下每一个人又都有着非常严谨的个性，他们竟然又是个性鲜明在展现这种完美统一的。仅以此就断定科塔萨尔的伟大是非常靠谱的。



《克拉小姐》是一个通常意义上的小事，但作者用巧妙的形式赋予它灵性。小说没有一句人物以外的描写，多重视角下一个简单的故事却令读者充满阅读快感，作家的想像力以及他对小说形式的创新，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一个觉得自己已经长大了的男孩在医院里，与一个美丽的护士小姐产生一种说不清但似乎每个读者都明白的情感，再加上男孩的母亲，作者分别用几个主人公的视角来叙述同一个故事，细腻并让人看不出一点偏差，每个人的视角下都是那么逼真地反映出这个人物的一切，包括价值观、视野、内心和习性。这得说，这样的小说本身已经具备了教材性，它用一种并非复杂的方式让小说这门艺术在某个尺度和方向上有了最恰当的阐释。

《万火归一》这部短篇小说集几乎每篇都是让人惊喜的作品，他们在形式和技巧上，科塔萨尔几乎是前无古人地给予了最恰当的创新。比如《南方高速》是那种全景式众人像出场的写作，这当然首先是一种技术上的追求。不过，仅仅裸露出技术的小说，常常会失去读者，因为你没有使作品产生一种“感同身受”，作者本人没有与作品发生必然关系，也就无法令他的读者与作品产生这种感同身受。比如《会和》，这篇描述当年切·格瓦拉一场丛林中战役的小说，我不知道格瓦拉以及解放战争对于科塔萨尔来说有什么重要性，以至于让他充满虔诚和实验精神地来写这样一篇小说，但是仅凭小说的文

字来说，作者没有让读者感受到作者与作品之间的那种必然联系。这或许跟单纯的炫技差不了多少，有灵性或激情，但这并不能说明一切。

我在这种充满膨胀感的精彩短篇小说阅读中，的确有时会存在着这样一种感受，就是科塔萨尔太聪明和赋予技巧了，以至于让他在自己的作品中消失了，作为读者我找不到作者的影子，也就是说，这篇小说跟作者的关系在哪呢？在我看来，在艺术作品中发现艺术家在其中的呼吸是一件至关重要的事，除了技巧和才华，你还得让人在不知不觉中发掘一点你自己的气味或者声音，这种气味和声音的存在使你的读者不至于把事情弄混，或者忽略你真正的灵魂。

说到这里，我觉得可以说出一个真相了，那就是科塔萨尔短篇小说大师以及伟大作家的称号，一定是评论家和作家同行给的，而不是读者。这两者当然有区别，我以为，福楼拜、马尔克斯以及曹雪芹这类作家头上的封号，绝对主要是来自他们的读者，最普通的那种读者，随便、偶然抓起来《包法利夫人》、《百年孤独》、《红楼梦》这样小说来看，一下子就看不入迷的普通读者。

【阿根廷】胡利奥·科塔萨尔：《科塔萨尔论科塔萨尔》，朱景东译，1994年，11.20元；《跳房子》，孙家孟译，重庆出版社，2008年，32元；《万火归一》，范晔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6月，22.00元。

BOOKREVIEW 书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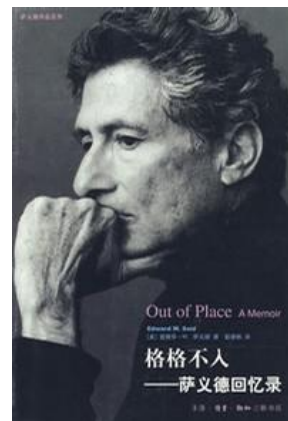
一种凸显勇气的晚期风格

特约撰稿人 凌越（广州，iamlingyue@yahoo.com.cn）

在回忆录《格格不入》第九章，萨义德细述了他获知自己罹患慢性淋巴性白血病的情形：1991年9月，萨义德去伦敦参加一个由他召集的有关巴勒斯坦民族自决进程的会议，会议期间，萨义德打电话到纽约给妻子马莉安，问自己一年一度体检的验血结果如何，萨义德当时担心的只是自己的胆固醇，可是从妻子犹疑的语气中萨义德似乎感到某种不祥，他当即打电话给他的家庭医生，从而获知自己罹患了这一慢性绝症。“我费了一个星期，才消化掉这一诊断的最初冲击。……又过了一个月，我才领会悬在我头顶的这把‘德莫克利斯之剑’给我的震撼有多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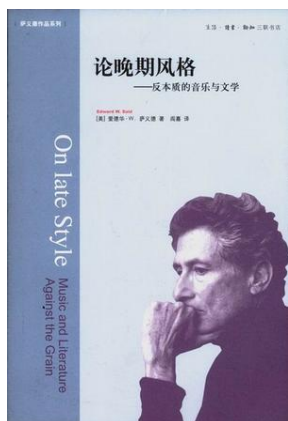
显然，对于萨义德来说，这是一个重要的时刻，作为一个分水岭，萨义德的写作被分为之前更多的关注社会、民族、国家等宏大主题（1991年他在伦敦开的那个有关巴勒斯坦前程的会议即是明证）的写作，以及之后的更多对于自己过去的回忆和自省，以及带有沉思性质的写作——当然作为一种惯性，萨义德前期的更具公共性的写作不可避免地要渗透到他后期自省以及个人意识的最深处，从而使他的自省和沉思也独具一种厚重的质地和魅力。在《格格不入》前言里，萨义德写得明白：“数年前，我得到一个看来致命的医学诊断，我觉得有必要为我在我生于斯、长于斯的阿拉伯世界所过的生活，以及我念高中、学院与大学在美国所过的生活，留下一本主观记述。”

这是一本少有的沉痛而感人的回忆录，我至今还记得几年前阅读《格格不入》时所受到的震动。的确，家仇国恨以及萨义德自己所患的绝症，赋予这部传记独特的沉郁沧桑的氛围，而给我印象最深的则是它的思辨色彩。就像小说家就算是在写作家评论时也像在写一个故事（典型如毛姆的《巨匠与杰作》和奈保尔的《作家看人》），评论家在写回忆录这样的叙述文体时有时也好像在做论文。几乎充斥整部书每一个页码的思辨色彩，一方面减弱了回忆的感伤气息（当你极力观察自己的伤痛时，这伤痛恍惚间似乎逸出了体外），另一方面这思辨其实强化了感受的质地，痛苦因抑制而更形强烈。作为一个训练有素的批评家，像这样的直抒胸臆对萨义德来说是绝无仅有的，尽管酣畅淋漓，但是终究算是一种面对命运的情绪化的反应。在写作《格格不入》的后期和之后，萨义德职业性的理性思辨终于冲破了往事的藩篱，在更为纯粹和抽象的领域里结出了萨义德后期生命中的另一硕果，那就是副标题为“反本质的音乐与文学”的《论晚期风格》。



如果说《格格不入》是萨义德对残酷命运的情绪化的反应的话，那么《论晚期风格》则是对这一命运的理性化的反应。它们是一个事物的两面，萨义德分别以自己的情感和智慧出色地回应了命运的重击，而且始终保持着自身的优雅。在《论晚期风格》里萨义德似乎又恢复成原本那个洒脱的智者，他任凭自己的思绪在一众他热爱的作家、诗人、音乐家晚期作品中自由翱翔，品评其中的苦涩和美妙——通常这二者紧密相连，难以割舍。在本书中，萨义德完全将自己的个人生活剔除，他非常有风度地将自己的智慧完整地奉献给他所评价的小说、电影和音乐，但是所有这些论述你又可以理解为总体上其实是萨义德某种程度的自况，甚至你只有在了解萨义德写作此书的时间和状态时，或是在阅读《格格不入》之后，才能真正深入地理解这本书。尽管萨义德的好友，美国著名文论家迈克尔·伍德在导论里说，萨义德在1991年9月之前就在自己的笔记里写下过，理查·施特劳斯的晚期作品的再现是“彻底的、优美的、精心阐述的，是那种其快乐和发现被允许放射出来的音乐”，可是萨义德在自己生命的最后阶段集中精力于此议题，显然是受到那一致命医学诊断的驱使，或者可以说得更直接一点，是受到死亡的驱使。

上文提到在《格格不入》里，那一诊断带给萨义德的冲击，但他坎坷的命运造就的坚韧性格，使他不可能束手就擒。他在众多大师的晚期杰作中琢磨着大师们面对死亡的态度，一方面也在暗暗检验着、校对着自己面对死亡的态度，最终在一种凸显勇气的绝不妥协的态度中，萨义德也找到了自己的力量之源，这力量使他和死亡整整搏斗了12年，并且写下了大批著作——不仅仅是《格格不入》和《论晚期风格》，还包括他中期“理论期”和“政治期”的延续，比如政治性很强的《和平进程的终结》、《权力、政治与文化》、《从奥斯陆到伊拉克以及路线图》等；我还记得2003年我在《书城》做编辑时编发过萨义德的《关于美国的思考》，文章对美国政府当时的政策提出尖锐批评，文风沉郁有力，根本看不出那几乎是萨义德的“绝笔”了，到那年九月，萨义德在67岁的年纪上去世。



《论晚期风格》的写作几乎贯穿萨义德“晚期写作”的全过程，1997年台湾学者单德兴曾专程去纽约访问过萨义德，他提到正在写作的三部作品：一本有关歌剧，一本有关艺术家的晚期风格，再就是“我在写回忆录”。两年之后27万（中文）字的回忆录就出版了，可是有关晚期风格的书只是在他死后，在迈克尔·伍德精心编辑下作为遗著才得以出版。伍德说得很对：“我无法相信他想完成这部书。完成这本书太像是在书写人生终结，要结束那个关于自我发展的漫长的篇章。”而萨义德写作的目的可不是为了终结，在最低的限度上，萨义德写作《论晚期风格》是为了廓清自己对于死亡的思路，同时它的确具有美学上所有的复杂性、可能性和最重要的文本的魅力。尽管美学有着抽象的表征，但是和一切艺术形式一样，它其实深深扎根在我们的生活之中，那么探究它也就很自然地同时包括了主客观两面。

在书的第一章《适时和晚期》中，萨义德厘清了晚期风格的两种类型，一种是我们某些晚期作品里会遇到某种被公认的年龄概念和智慧，“那些晚期作品反映了一种特殊的成熟性，反映了一种经常按照对日常现实的奇迹般的转换而表达出来的新的和解精神与安宁。”他举的例证是莎士比亚和索福克勒斯。但是萨义德感兴趣的是第二种晚期类型，“它包含了一种不和谐的、不安宁的张力，最重要的，它包含了一种蓄意的、非创造性的、反对性的创造性。”这决定了萨义德在选择所评对象的时候一定有着异乎寻常的视角。比如在音乐家里，萨义德花费大量气力分析的是贝多芬和理查·施特劳斯的晚期作品，一般看来贝多芬晚期的第31号奏鸣曲“明显很粗糙简单”，对施特劳斯经典的看法则是他晚期作品“退隐到过于甜蜜，相对倒退的音调，以及在知性上驯服的世界之中”，当然最终萨义德都予以有力的反驳，那些最初显得簇新的“新音乐”后来被证明比贝多芬和施特劳斯晚期被批评的音乐老迈得多，“在曾经裂开了一道可怕深渊的地方，如今延伸出一座铁路桥，旅客们从桥上可以舒适地向下俯看那深渊。”贝多芬当年看来不合时宜的晚期作品倒以其社会抵抗性，处在我们时代的现代音乐的新奇之处的核心，而施特劳斯晚期作品则“使音乐更加深刻地与当代实用性的问题相联系”。

值得注意的是，萨义德敏锐地意识到从身体状况出发着手批评的局限之处，他并不愿意人们简单地将《论晚期风格》视作他自身状况的某种隐喻，因而在对贝多芬晚期作品的评述中，他仍然强调了作品本身的某种自足性，尽管强调它终究是从生命中生发而来：“只有在艺术没有为了现实而放弃自身权利的情况下出现的东西，才属于晚期风格。”基于此，整本书弃绝了感伤情绪，而是在纯粹的思之愉悦中展开对“晚期美学”的抽象思考，当然在这一过程中难以避免的要碰触“死亡”，但是在这种情形下，“死亡”也不再是那个阴森的虚空的黑洞，而只是可以被平等、从容探究的研究对象而已，如此，我们也可以说，萨义德凭藉思的力量战胜至少是延缓了死亡那阴沉的力量。

这似乎是一种面对死亡的技巧，但是在不断地冷静地研究死亡的过程中，一种生之勇气在萨义德体内缓慢但却不可阻挡地回潮，看看散落在书中的一些片段，我们或许可以真正明白萨义德心之所系，在第四章“论让·热内”中，萨义德写道：“在热内晚期的那部伟大的散文作品（指《爱的俘虏》）里，人们可以看出他的热衷与他的忘我进行着斗争，而他的西方的、法国的和基督教的身份，则与一种全然不同的和他者的文化进行着搏斗。……要理解热内，最终就要承认其感悟力绝对未被驯化的特性，它坚持不懈地要返回到那个把反叛、激情、死亡和再生联系起来的领域。”在第五章“徘徊不去的旧秩序”的结尾，某种自我激励更是溢于言表：“他们（指施特劳斯、兰佩杜萨、古尔德和热内）已经达到了年纪，不想要任何假想的平静或成熟，也不想要任何和蔼可亲或官方的讨好。然而，在他们当中没有哪个否定过或逃避过死亡，但却不断地返回到死亡的主题上，而这个主题破坏了、并且奇怪地提升了他们对于语言和美学的运用。”请注意最后一句话明显的矛盾，死亡主题对于美学的破坏和提升，它们在同一个维度里共存。这一矛盾其实贯穿整本书始终，真实而准确地对应着萨义德内心深处的矛盾，同时这一矛盾也非常人性，道出了人们获得勇气或者说直面死亡的艰难，话说回来，这一过程的艰难也映现出最终获得的勇气的弥足珍贵。

在《格格不入》里，萨义德毫不掩饰地坦承他个性中软弱和伤感的那一部分，比如在第九章，萨义德写到他父母初次送他到美国学校就读时和父母的离别：“他们随即快速离开，留我喉头哽咽，看他们从视线中消失。空虚突然袭来，我在赫蒙山必须忍受的一学年孤独，几乎令我无法承受，但我也必须回到房间里，寻觅母亲方才的身影，她的气味，她经手的痕迹，甚至巴望找到一张留言。”对于自己的疾病，萨义德也坦率得惊人：“我被诊断得了血癌，有一段时间满脑子受苦与死亡即将来临的惨烈念头，整个人几乎动弹不得。”这和我们印象中那个尖锐地抨击美国政府，勇敢地回到巴勒斯坦，并和巴勒斯坦青年一起向以色列士兵掷石的斗士萨义德有着天壤之别的差距，而这两者之间的桥梁其实正是《论晚期风格》。他在研习晚期美学的同时也在研习着死亡，并最终接受了那把悬在头顶的“德莫克利斯之剑”，有时甚至可以坦然直视着那把剑的凛凛寒光。《论晚期风格》再次显露萨义德在批评领域精深的功力，其思维的缜密和细微在他自己的批评著作里也属上乘，可是许多人仍然被书中的人格力量所吸引，正如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所说：“萨义德本人就是‘作为知识分子的艺术家的一个典范，它是对萨义德的人品的深刻陈述，只有当我面对着自己生命的晚期阶段不可避免的困境时，我才可能从中寻找到勇气。”的确，所有的优秀书籍其实都是某种程度上的人生之书，由血和泪铸就，哪怕它看起来貌似纯智力演绎。

[美]爱德华·萨义德：《格格不入》，彭淮栋译，三联书店，2007年6月，26元；《论晚期风格》，阎嘉译，三联书店，2009年6月，19元。

BOOKREVIEW 书评

米勒的典型性中国之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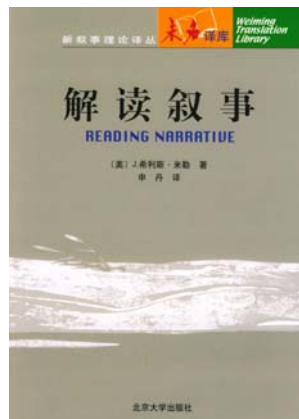
特约撰稿人 罗四鸽（上海，luosiling_china@163.com）

“文学的时代已不复存在，文学将要面临终结！”

2000年的金秋北京，在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召开的“文学理论的未来：‘中国与世界’”学术研讨会上，“耶鲁四人帮”之一、留着一腮整洁雪白大胡子的J·希利斯·米勒对文学发表了一个悲怆的宣言。一霎那，国内学界千层浪起，群雄激辩，檄文纷飞。已逾古稀之年的米勒亦成为中国学界红人，频频来华，到各大高校学术机构演讲，多次提出“文学终结在即”的观点，掀起一股“米勒文学终结论”的热潮。

不过，现今回首，米勒的中国之旅，似乎与他的前辈或同辈们（如形式主义、精神分析批评、原型批评、新批评、女权主义批评、结构主义批评、解构主义批评、西方马克思主义批评、后现代主义批评、后殖民主义批评、新历史主义批评等等）相似，不仅短暂，而且也未尝摆脱“橘生淮北则为枳”宿命。

在对米勒进行“原装引进”和“补课学习”之后，要理解“米勒命题”在美国本土并未



引起多大的反响,却把中国的天捅了一个大窟窿的原因,以及解开“橘生淮北则为枳”之谜,可以说是轻而易举的,甚至米勒本人在北京语言文化大学的演讲《全球化时代文学研究还会继续存在吗?》中,便已道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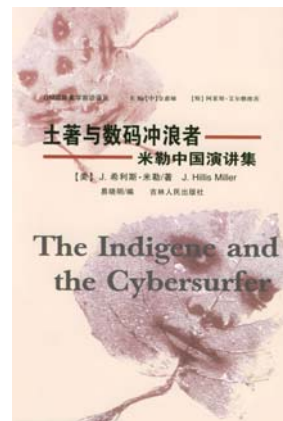
在他的演讲中,米勒首先引用德里达《明信片》中的话:“……在特定的电信技术王国中,(从这个意义上说,政治影响倒在其次),整个所谓的文学时代(即使不是全部)将不复存在,哲学、精神分析学都在劫难逃,甚至连情书也不能幸免。”为什么会这样呢?米勒指出,因为,“在西方,文学这个概念不可避免地要与笛卡儿的自我观念、印刷技术、西方式的民主和民族独立国家概念,以及在这些民主框架下言论自由的权利联系在一起。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学’只是最近的事情,开始于17世纪末、18世纪初的西欧。它可能会走向终结,但这绝对不是文明的终结。事实上,如果德里达是对的(而且我也相信他是对的),那么,新的电信时代正在通过改变文学存在的前提和共生因素而把它引向终结。”

那么“这种文学存在的前提和共生因素”又指什么呢?米勒接着指出“德里达在《明信片》这本书中表述的一个主要观点就是要打破过去在印刷文化时代占据统治地位的内心与外部世界的二分法(insideoutsidedichotomies)……明信片代表而且预示着新的电信时代的公开性和开放性(publicityandopenness),任何人都可以阅读,正如今天的电子邮件不可能封缄,所以也不可能属于个人。”就米勒所论来看,这里所谓“文学存在的前提和共生因素”,主要指“过去在印刷文化时代占据统治地位”的一些因素,如私人生活空间的隐秘性、自我意识或精神生活的独立性(甚至是孤独性)、内心与外部世界二分所造成的距离等。而这些因素不仅是旧式文学,而且也是德里达所提到的与文学命运与共的情书、哲学、精神分析学等存在的前提。比如情书的特点便在于彼此的分离和情感的隐秘性,是一种通过“距离”达到彼此沟通,情感升华的方式。然而,电信技术的魔力却将思念的距离轻易消融。在电话或因特网上,“我”变成了另外一个人,再也不是原来那个亲自提笔写情书然后再通过邮局邮寄的那个人,从笛卡尔一直到胡塞尔的哲学所赖以存在的主客体之间的二元对立也极大的被削弱了,因为电影、电视或者因特网的屏幕既不是客观的,也不是主观的,而是一线相连的流动的主体性的延伸,这可能就是德里达所说的“新的电信时代将会带来哲学的终结的内涵之一。”

而以语言为媒介、以情感为动力的文学,它的神奇之处是创造一个虚拟的现实,而这个现实的存在是与外部世界分离和对应的,所以只能通过个体化想象与个体体悟来把握和体验,它一旦变得现实化,感观化或直观化,就无异于消解了它的存在。换言之,印刷文化时代内心与外部世界的二分,是由语言来实现阻隔或拉开距离的,同时又通过语言和借助想象来实现沟通与联结,因而书籍的想象和阅读完全归属于自我,甚至是孤独和排他的,所获得的体验也是个体化、独特和隐秘的。在电信时代,这些曾经比较稳固的界限日渐模糊:自我裂变为多元的自我,主客二元对立大大削弱,再现与现实之间的对立也产生动摇,新的电信技术改变了大学和民族独立国家的界限,不同媒体之间的界限也日渐消失,甚至意识与无意识的区别也不复存在,而且,新的电信技术产生了新的意识形态的母体。可以说,电信时代完全改变了文学所由产生的环境和共生因素,并使其走向衰落;而以这种文学存在为前提的文学研究也将随之走向终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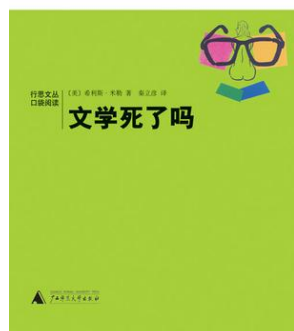
由此可见,米勒“文学终结论”的“文学”不是指一种学科门类或一种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实体,而是指一种出现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具有特殊的历史内涵的文化话语。它是在十七、十八世纪以后印刷业得到全面推广的现代社会中形成的,它完全基于西方现代人的二元对立思想之上,因而与其他的现代概念如“自我”、“民族国家”、“哲学”、“心理学”等一样是二元对立思想的产物,是逻格斯中心主义的。此概念的显现和定形最终是由现代思想家笛卡尔、康德、黑格尔、胡塞尔等的理论叙事完成。因此,在米勒那里,文学是现代人的文化建构物,是西方现代社会中的一种强有力的文化话语。

而所谓的“终结”,亦并非简单理解的死亡或消失,或是给文学判“死刑”。与西方文艺理论的哲学血脉相关,米勒所说的“终结”有着浓厚的哲学立场和意味,且并不是一个新鲜的话题,可追溯至黑格尔的艺术终结论与德里达有关文学终结的表述,以及西方诸多文化理论家提出的诸如“艺术的终结”、“历史的终结”、“意识形态的终结”等理论话题。在诸多呼应文章中,学者余虹对“终结”的解释与黑格尔、米勒的“终结”似乎最为神似:“当代文学终结论乃是对后现代条件下文学边缘化的诗意表达。‘终结’(end)一词含混、夸张而悲哀,其本身就是一种文学隐喻,他的确切含义是‘边缘化’。”并认为“边缘化”具有两层意涵的界定:一层意思指文学失去了它在艺术大家族中的主导地位,已由艺术的中心落到边缘,其主导地位由影视艺术所取代;另一层意思是指,在文化分类学眼界中的文学终结指的是文学不再处于文化的中心,科学



上升为后现代的文化霸主后文学已无足轻重（《文学的终结与文学性蔓延》，《文艺研究》，2002年6月）。

Routledge
On Literature



可惜的是，初听到米勒的“文学终结论”时，国内许多学者，甚至包括某些权威，不是在后一种意义上理解米勒的文学的，而是在前一种意义上理论米勒的文学的，并将其命题简单理解为“文学死了”，并由此进行无的放矢鸡同鸭讲的争辩，甚至将米勒之论视为洪水猛兽、蛊惑之言。尤为可笑的是，竟然还有作家拍着胸脯、立下誓言：只要我还活着，文学就不会死！不过，对米勒进行的最有中国特色的“误读”还是一位叶氏诗人，在对复杂的问题简单化，简单的问题复杂化后，发表一系列文章，直接粗暴地宣判了中国文学的死亡，并列出了14条死状，大有最不讲理的人最会讲理的气概。

在诗人宣判文学死了不到一年的2007年5月，米勒写于2002的论著《on literature》在国内翻译出版，对比2004年6月出版的米勒中国演讲集《土著与数码冲浪者》，这本生动活泼的小书更能显示米勒的扎实理论功底和深厚文学素养，也更能消除国人对其的误解，不过，中文书名用的却是曾经引起最大误解的一个：《文学死了吗》。好在，此时，无论是学界还是网络，早已对此话题处于“失语”状态，几乎没有人注意到这本归为“口袋阅读”的书出现。至此，米勒也完成了他的典型性中国之旅。

[美]米勒：《解读叙事》，申丹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15元；《土著与数码冲浪者：米勒中国演讲集》，易晓明编，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年，28元；《文学死了吗》，秦立彦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23元。

BOOK REVIEW 书评

生计与人生关键的选择

孙传钊（上海，sunchuanzhao@yahoo.com.cn）

我是读了高山杉的《〈忆往叙实〉的“实”与“不实”》（《东方早报·上海书评》2009年7月5日）后，出于好奇，才读李幼蒸的《忆往叙实》的。就我个人好恶而言，我是很喜欢这本书的，即使作者的回忆有所“不实”，但是该书大胆言及的不少学人往事却是鲜为人知，于我耳目一新。

由于近10年来我常为收入低迷，生计艰辛困惑，所以，在我看来50年前李幼蒸主动从天津大学建筑系退学，弃工（科）从文（科），可以说是一惊人“壮举”。殊不知那时代，不像如今在体制之外还有些栖身的狭隘夹缝，尚可艰难谋生，退学就意味着不仅从此失去了“前途”，还丧失了所有谋生机遇——李幼蒸从此就成为靠父亲每月从工资中拨出20元，作为一个城市里的“社会青年”存活下去。以致默认这一“壮举”的父亲李蒸，在10多年后在遗言中要求其他几个子女在自己百年后每人给李幼蒸5月生活费。要知道那年月，谁能预测到20年后中国要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路？何况李幼蒸选择专攻的洋文和西方哲学，对于生存、命运来说都是最危险的学科。李幼蒸还是幸运的，靠父亲接济20元生活费的“外语学习者”不仅娶了有饭碗、有文化的妻子，还盼来了1970年代末的“科学的春天”，进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当然，能有这个侥幸的结果，坚持20年不回头的刻苦自学是一个必要条件，这却是常人难以做到的。

与姐姐写的追忆父亲李蒸的文章不一样，李幼蒸在《忆往叙实》关于父亲一生功过的叙述、评价，比较公允，并不是顺应体制统战政策的套路对其一生一味颂扬，基本上是否定父亲三年内战期间作为一个文人从政的那段历史。在“留在大陆了”一节中，他写到父亲因为作为南京政府赴北京和谈代表，和谈破裂后，因为不能随意迁移，不得留在大陆（也被撤到台湾的国民党政府宣布为叛逆分子）。但是，值得注意的，接下来他还提到自己的丈人方兆镐——抗战时国民政府“兵工署负责美中军输得驻印官员和战后公路总局局长，担心无法在海外支撑一个大家庭，决定留在大陆，后一直执教于北京



钢铁学院”。我作为一个读者猜想，方兆镐是国民政府中的技术官员，懂英语，所以曾驻印度，与美英盟军共事；有专业知识，所以后来能“一直执教于北京钢铁学院”。时运不济，长年战乱后的中国国家异常贫困，败走台湾国民党连能否守住这一孤岛都还在忧心忡忡，发展公路建设设想八字还没有一撇，他这个公路局局长无论赴台、还是远走海外，都无法支撑一个大家庭（今天成了世界第二大经济实体的中国的各级公路局局长倘若面临海外移民，就不会有这样忧虑了）。养家活口的生计决定方兆镐“留在大陆了”。

方兆镐那样有一技之长的国民党政府中级官员尚且如此，单纯的文人、学者如果没有偌大的家私，要想离开大陆移民海外也面临同样的生计困境。台湾局促之地仅能接纳极少数中央研究院院士那样顶尖学者，香港的高等教育不成规模，海外各国大学尚未“大众化”，那时候大陆以外的大学能收容多少来自中国的文人、学者？何况 60 年前欧美，不是处在今天全球化的历史背景下，其学术界对中国社会、中国学重视及其人才需求的程度，与而今相比，不能同日而语，不可能因为非学术原因，为不谙西方主流学科或非世界一流中国学者提供解决其生计的职位。何况刚建立的中国新政权还未对知识分子表现出大动干戈的态度。我们今天在缅怀、讴歌老北大、老一辈学术大师的同时，不能忘记 60 年前的中国的大学及其学术水平，也是与其国力呈正比，并非领先于欧美，就如像理论物理学这样具有相当基础、人才辈出的学科，不少杰出的学者最后学业和成就也是在欧美完成的。即使传统的国学、史学，就算那个时代我们有陈寅恪、王国维这样一代师宗，也不要忘记比邻的日本学人在“东洋学”这个领域中的整体实力（2003 年薛涌已经在《甘阳与文化民族主义》一文中提醒我们不要因为有一个陈寅恪就自大，不要忘记同一领域日本学者的群体）。

1950 年代初，自由进入香港的大门一时还没有关上，可以通过香港走向海外的那几年，即使信仰自由主义大陆学人不远走海外的另一个原因，恐怕就是担心海外生活的语言障碍，外语也是不能回避的海外谋生工具。李幼蒸在《忆往叙实》中，谈到他成年后自己几十年自学外语的甘苦，虽掌握几门外国语，很长时间都处于只能阅读的“聋哑外语”水平，即使 1980 年代到了德国后，依然不能完全运用德语与德国学者交流。为了强调运用外语写作之难，李在书中还重新提到汪荣祖在《史家陈寅恪传》中援引的材料，即陈寅恪在与友人信中承认自己难以用英文写作论文一事，以此证明非母语之外语的读、听、说、写四项技能中，写作最难。这让我想起另一大师胡适博士论文《先秦名学史》也使用中文写的，1917 年因为三位审查该论文洋人导师不谙汉语，10 年后才拿到博士学位。其实，这于成年后学外语者来说，是非常平常的事情。即使对欧洲大学者来说，成年后移居他国使用同属印欧语系十分亲近非母语，可能很快能达到在日常生活中听、说无虞水平，

但是要用这外语写作学术论文也非易事。政治学大师卡尔·弗尔德里希（Carl J. Friedrich），汉娜·阿伦特从德国移居美国多年后，他们的英文著述都必须通过助手、编辑的修改、润色后，才能刊出。阿伦特前夫君特·斯特恩（Günther Stern）战后最终选择回欧洲主要原因之一，也是困于在美国度过了好几年还是不能得心应手使用英语来进行学术写作和思考。

我们还可以从洛维特的回忆《纳粹上台前后我的生活回忆》（Mein Leben in Deutschland vor und nach, 1933, 区立远译，学林出版社，2008 年）中，看到 1930 年代不少德国犹太人学者类似的境遇：他们在面临生存危机时，也因为一时在海外找不到合适饭碗，出于为未来生计担忧，迟迟不离开德国。就连非犹太人的著名学者斯普朗格在纳粹掌权几年后也完全失去 1933 年纳粹上台时发表抵制纳粹文教政策的那种勇气——主要原因，怕失去习惯了饭碗。洛维特把斯普朗格作为德国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典型，做了如是批评：



他是一个德国人，必须在德国生活下去，所以不管愿意不愿意，只能接受，……所以放下他的顾忌，把自己投身于一件

任务之中，并将之视为一种爱国者的义务，……于是便跟大家一起扛起一件恶劣之事的责任，……没有人愿意放弃一份已经习惯又做的很好的工作。（140 页）

我想，方兆镐的选择是具有代表性和普遍性的，许多中国知识分子 1950 年代初最后没有离开大陆最根本原因，并不

是他们以后在政治高压下，顺水推舟、言不由衷地说自己出自对新中国、对党的热爱，放弃了去海外发展学术事业的良机，留在大陆了，绝大多数人的人生选择并非出自的信仰，而是从个人生计、利益的考虑。当然，这也只是我的未经过实证研究证明的一种假设。1990年代佛罗里达州立大学教授罗伯特·盖拉特莱（Robert Gellately）诸多关于纳粹的实证研究，曾得出一个与众不同的结论：德国民众支持纳粹既非出自反犹太本能，也非纳粹宣传、洗脑的结果，也不是出于意识形态的信仰，而大多带有各种不同私人动机，为了获得某种利益。希望谢泳等从事这一领域研究的学人，也能在研究众多著名知识分子为何不离开大陆的论题上有所作为。

李幼蒸：《忆往叙实》，重庆出版社，2009年2月，36元。

BOOK REVIEW 书评

一场迅速平息的“暴乱”

观察员 王晓渔（上海，wxy1978@hotmail.com）

6月27日，欧洲各国代表聚首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整整20年前，匈牙利和奥地利两国外长剪破两国边境上的铁丝网，使得“铁幕”出现第一道裂痕，此后上万东德国民由此绕道抵达西德，成为柏林墙倒塌的先声。关于20年前的匈牙利，我所知甚少，它不像捷克斯洛伐克拥有哈维尔，也不像波兰拥有“团结工会”，甚至不像罗马尼亚拥有一个“伟大的小丑”齐奥塞斯库。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公众对匈牙利的了解，似乎只是裴多菲，对裴多菲的了解，只是“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对于这首诗的了解，也仅限于把它当做名人名言。对于裴多菲投身的1848年革命，对于诗中的“自由”，对于匈牙利的历史尤其是“裴多菲俱乐部”，我们只是浅尝辄止、悬崖勒马。

《燃烧的多瑙河：匈牙利1956年事件真相》把目光聚焦在1956年的匈牙利，即“裴多菲俱乐部”前后的匈牙利，主要是10月23日至11月4日的12天。虽然时间跨度有限，但是一叶知秋。作者侯凤菁曾任新华社布达佩斯分社首席记者、东欧室主任，这让我想起《波兰独立之路》（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6月）的作者、曾经担任中国驻波兰大使馆一等秘书的郭增麟先生。这些著作都是他们自留地里的成果，因此写作风格与他们的工作文体迥然不同，更具个人特色。侯凤菁还是《炎黄春秋》的作者，先后发表《还纳吉以清白》（2008年第2期）和《裴多菲俱乐部真相》（2008年第5期）。

侯凤菁讲述的这段历史，沉郁顿挫：

二战时期的匈牙利属于法西斯阵营，战后一度是多党联合执政，随后匈牙利劳动人民党通过“切香肠”的分割战术成为唯一的执政党。斯大林“最好的学生”拉科西确立了一党制之后，开始党内清洗，席卷了三名党的总书记、一名国家主席、若干名副总理、几十名部长、约百位将军，一个900万人的国家有150万人被起诉。一些久经考验经受过盖世太保严刑拷打的高级官员，对自己勾结海外反动势力试图颠覆政权的罪行供认不讳。他们为什么会这样？有很多种解释。一名内务部长出狱后对朋友说：“霍尔蒂和盖世太保统治时期的监狱是够坏的了，但是与拉科西统治时期的监狱中受的折磨相比，根本就算不了什么。”还有一种解释是“苦肉说”，即告诉这些同志，党知道他们是无辜的，但为了唤起人民的革命警惕性，他们需要忍辱负重，在法庭上扮演特务，于是这些同志信以为真。与此同时，国内建设贯彻斯大林“没有重工业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精神，一方面工人和农民享受不到“按劳分配”的生活用品，另一方面高级官员却感觉已经提前进入“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

这种“外嫩里焦”的局面难以为继，1953年斯大林死后，苏联老大哥决定拉科西下、纳吉上。纳吉是一位久经考验的同志，曾经担任过高级职务，由于不同意农业迅速地、全部地合作化，一度被发配到首都以外的地方。他上任后，开始了“新阶段”改革，取得成效，以至于没有全退的拉科西认为“人民生活水平太高了”、“应该加以严格紧缩”。1955年，随着苏联内部的人事更迭，纳吉下、拉科西上。59名知识分子联署一份“备忘录”，反对在文艺领域推行强制的行政手段，



此举被视为“反党反人民”，签名者受到惩罚，纳吉也被株连。但此时，纳吉正在将注意力放在撰写政治论文上，他表示“实践是检验理论的标准，而不应该使生活服从糟糕的理论”。1956年苏联“二十大”使得东欧也感受到解冻的暗流，裴多菲俱乐部成为万众瞩目的焦点。“万众瞩目”并非夸张，一场讨论会从下午六点半持续到次日凌晨四点，听众多达6000人，甚至秘密警察都向上级表示无法继续执行任务，因为他们开始赞同发言者的观点。于是，拉科西下、纳吉上。此次拉科西是全下，直接到苏联定居，直到去世也没有还乡。纳吉开始为冤假错案平反，学生要求实行民主政治、进行经济改革、实现民族独立。

10月23日，布达佩斯各界群众进行集会，重申学生的要求。根据华沙条约，苏联驻军只有应所在国政府要求才能出兵，但是10月24日，苏军不约而来，坦克驶上布达佩斯的街头。不明真相的苏联士兵被告知匈牙利首都发生了暴乱，但是当他们遭到市民的顽强抵抗，开始怀疑甚至倒戈。市民也极尽所能，进行说服教育工作，双方成功地进行了军民联欢。在场的美国记者，目睹了“军民鱼水情”的景象，感慨“这是我一生中看到的人民与外国军队之间的最愉快的交往”。布达佩斯警察局长努力与市民和解，他事后因为立场不够坚定被判处无期徒刑。但是，当时皆大欢喜。尽管也出现了一些不和谐的插曲，比如国家保安局的同志常常被市民搜出处以私刑，但这仅仅是插曲。10月30日，纳吉表示匈牙利结束一党制、恢复多党制。同时，苏联也表示愿意撤出苏军，与匈牙利就撤军问题进行谈判。

一切都朝着大团圆的方向走去。然而，接下来的历史如同过山车，进行着极限运动。10月31日，已经撤退的苏军重新回潮，有过之而无不及，匈牙利目瞪口呆。11月2日，苏联大使照会匈牙利政府，第二天将派代表团就撤军问题进行谈判，后者喜出望外。11月3日，谈判顺利得难以置信，历史再次朝着大团圆的方向走去。11月4日凌晨，10万苏军挺进布达佩斯，镇压“反革命暴乱”，纳吉短暂地在南斯拉夫大使馆避难，离开大使馆后被捕，经过“三起三落”，最后放弃“请求赦免”的权利，选择了绞刑架，30多年后，获得平反。

侯凤菁参考大量中文、匈牙利文著作，讲述了激情燃烧的12天。书中还附有很多插图，其中两幅最让我动容。一副是裴多菲俱乐部举行讨论会时的照片，由于人数太多，很多听众或坐或站在窗台上、街道上，侧耳倾听，他们非常安静，唯恐错过房间里传来的任何声音，很多听众陷入沉思。我相信，1956年之后，匈牙利一定会出现犬儒主义和公共事务冷漠症；但我同样相信，那并非“国民性”所致，这张照片已经说明布达佩斯市民对公共事务的关注。如果说他们后来表现出漠不关心，那并非他们的自由选择，而是“被选择”的结果。还有一幅照片是白天里空空荡荡的街道，那是布达佩斯工人委员会发起的消极抵抗，为了表达对苏军的异议，同时为了避免苏军找到再次镇压的借口，市民进行了空巷运动，整座城市在11月23日下午2点到3点空无一人，只有苏军和他们的坦克形影相吊。沉默，是对“暴乱”的最好诠释。

《燃烧的多瑙河：匈牙利1956年事件真相》也有一些细节，值得商榷。比如书中提到纳吉撰写的《国际关系的五项基本原则与我们的外交政策问题》，五项原则就是万隆会议所采纳的民族独立、国家主权、民族平等、领土不受侵犯和不干涉别国内政，一年以后，苏联肯定了这个主张。可是从时间上来说，1955年4月的万隆会议在前，1955年5月苏联与南斯拉夫的共同宣言也承认了五项基本原则，随后才是纳吉的文章。

阅读这本书时，最常出现的疑问不是细节出入，而是：如果匈牙利不是苏联的卫星国，如果“国内派”而非“莫斯科派”成为党内主流，历史会不会发生根本性变化？历史无法假设，这个问题也没有标准答案，正因为没有答案，让人时时思考。

侯凤菁：《燃烧的多瑙河：匈牙利1956年事件真相》，新华出版社，2009年4月，35元。

TRANSLATION 译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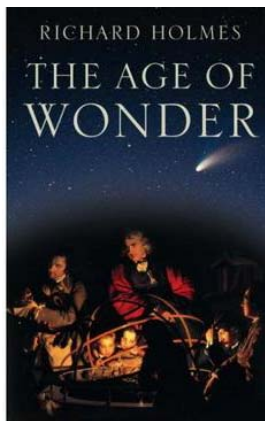
科学因何浪漫？

——当科学成为崇高恐惧的源泉

作者：亚当·科奇

译者：陈丹丹（南京，cheryl@live.cn）

上一次某项科学进展出现在报纸头版，是因为科学威胁着要毁灭人类。去年九月瑞士建成了大型强子碰撞器，迎接它的却是这样的大字标题----“碰撞器扣动世界末日恐惧的扳机”，而记者们在努力计算世界上最大的粒子加速器偶然扯断时空连续并毁灭地球的几率。令我们质疑科技进步的也并不尽是这样的末日情节：从哲学层次上看，科学的进展似乎也意味着人类的退却。达尔文过去了一个半世纪，仍有百万基督徒认为进化论是对人类尊严无法忍受的打击，正如百万环保人士认为科学是这个星球的灾祸一样。



这些二十一世纪的谜题其实已经伴随我们很久了。在《惊奇时代：浪漫主义的一代人是如何发掘科学的美与恐怖的》一书中，理查德·霍姆斯探索了十九世纪早期惊人的（常常也是令人恐惧的）科学进展，这些了不起的发现使地位低下的实验者们上升为国家英雄。霍姆斯的研究对象——包括天文学家威廉·赫歇耳，化学家汉弗莱·戴维，和探险家芒戈·帕克——都是英国家喻户晓的名字，但他们的发现绝不总是受人欢迎的。比如赫歇耳对星体的观察表明银河只是众多星系的一个，他们不断诞生、衰老并死去。赫歇耳警告我们：“银河是不会永存的”。正如霍姆斯接下来所说的，这一警告意味着“我们的太阳系，我们的星球，因而我们整个文明将会面临最终不可避免的结局。”头一次，末日天启脱离了宗教信仰的语境，成为论证出来的科学事实。

赫歇耳的发现代表着浪漫主义科学的一个面向。这个松散但有揭示性的术语是霍姆斯的发明，听起来好像是矛盾修饰。而霍姆斯也坦承：“浪漫主义通常被视为是对科学怀有严重敌意的文化力量。浪漫主义的主观理想是对科学的客观精神的永恒反抗。但我不认为一直以来都是这样，也不认为这两个术语如此互相排斥。‘惊奇’的观念似乎曾经可以，现在也能够把这两者联合起来。”

静观宇宙的无限与奇异可以催生出于崇高的恐惧，这是柯勒律治曾在《古舟子咏》中奋力表达的东西，华兹华斯也试图在他的自传性史诗《序曲》中唤起。在十四行诗《初读查普曼的荷马》中，济慈将自己文学探索上的情感比作“某个星空的观察者/当新的行星驶入他的眼界”；据霍姆斯解释，这是在暗指 1781 年赫歇耳发现天王星——《惊奇时代》众多详细讲述的故事之一。

与此同时，个人科学家名声的增长也使他们变成几乎是超人一般的传奇人物，就像拜伦式的浪漫主义英雄一样。探索的魅力是明显的：约瑟夫·班克斯自塔希提岛携来有色情意味的探险传说；芒戈·帕克花了两年时间绘制尼日尔河的流向图——他们回归英国时都是令人着迷的话题人物。（班克斯留英担任了很长时间的皇家学院主席；而帕克返回非洲并自此消失。）汉弗莱·戴维的魅力与他们不同。他独自在实验室里洞察自然最深邃的奥秘，第一次分离出钠、碘和氯元素。他的发现、他的有用的发明（包括供矿工使用的安全灯），以及他杰出的通俗讲座使他成为广受崇拜的社会名人。戴维赢得了骑士身份和一位富有的妻子，尽管正如霍姆斯所言，两者都没能使他幸福。同时，戴维也是一位有造诣的诗人，坚持认为科学与艺术看世界的方式紧密相关。“感知真理几乎总与感知美一样，是简单的感情，”他写道：“牛顿、莎士比亚、米开朗基罗和亨德尔的天才在特征上并没有相差很远。对于哲学的头脑，想象与理性都必须完美的。”人们可能料到戴维的密友，塞缪尔·泰勒·柯勒律治会做出类似的观察。的确，在 1880 年一封给戴维的信中，柯勒律治思考起科学与诗歌的亲合力：这位诗人认为，“必须由希望的热情来完成的科学是充满诗意的。”

这一表达对霍姆斯的吸引力不小，他将之扩展为：“科学同诗歌一样，不只有‘进步’。它引导一种特殊的道德能量和对未来想象性的渴望。它将一种绝对的信念奉为珍藏，那就是人类可以成功地营造一个更好、更幸福的世界。”

“活在曙光降临的时刻是幸福的”，华兹华斯如此赞颂法国革命，而科学革命也一样使人陶醉。

不过浪漫派诗人也有有力的措辞反抗科学，他们对科技的不信任一直影响到今天。科学使我们与自然、也与我们自身分离，华兹华斯在《全局改观》一诗中写道：“自然带来的知识是甜蜜的/是我们多管闲事的智力/损毁了事物美好的形态：/我们谋杀以便解剖分析。”

霍姆斯适时记述了济慈的一段很有名的轶事：在某次晚宴上，济慈抱怨牛顿“毁掉了彩虹的所有诗意，使其沦为棱镜”，并提议为“数学的混乱”而干杯。不是别人，正是柯勒律治说过“五百个艾萨克牛顿爵士的灵魂才比能组成一个莎士比亚或米尔顿”——这种看法，霍姆斯写道：“特别能激怒科学人士，现代人不例外。”

但是，浪漫主义对科学威胁的最有力的警告来自玛丽·雪莱的《弗兰肯斯坦》，霍姆斯用了一个章节来写它。《弗兰肯

斯坦》中讲到现代科学家如何“获取了新的、几乎无限的能量：他们能够指挥天雷、模拟地震，甚至用自己的影子嘲弄无形的世界”。霍姆斯表明，雪莱这么写是在暗指戴维。她书中的教训是，这些能量太大了，人类智慧无法驾驭——一旦释放出来，它们可能会反过来摧毁它们的主人，就像维克多·弗兰肯斯坦博士的怪物攻击他本人一样。雪莱的作品显然触及了英国社会的一根神经：“这本书因为1820年代的至少五个舞台剧改编而众所周知，如果不是臭名昭著的话”，霍姆斯写道。《弗兰肯斯坦》是一个时代的寓言，那时每一项科学进展似乎都有威胁的征兆，而威胁有时还实实在在。德罗齐埃发明的第一个载人热气球在1783年11月巴黎试航不久，美国驻法大使本杰明·富兰克林就开始想象气球战的可能性了：“五千只热气球每只载两人”可以使一个法国军队飞越海峡来到英格兰，“十万人从天而降，可以在许多地方构成无穷的危害。”甚至戴维在1799年发现的“笑气”也因其强烈的快感而使人不安。“愉快的感觉先是局部的，然后嘴唇和脸颊也能感觉到，”戴维记载：“它继而逐渐蔓延到全身，在实验中途有一个瞬间，这种感觉太强烈而纯粹以至于自身的存在也被它吸收了。在那个瞬间，而不是之前，我失去了知觉。”

这就是一氧化二氮。世界惊奇了，这是对人类的恩赐？是可能的医用麻醉剂？还是道德腐败和纵欲的借口？有传言说，人们曾在戴维的实验室里目击不可思议的情景：一个“年轻女性被歇斯底里的兴奋压倒后，冲出了实验室，在街上边跑边叫……”后来据说她很奇怪地扑到一只大狗身上，直到被拦住并带回来。”这听上去似乎是玛丽·雪莱梦中的场景。最终，《惊奇时代》将更多的信念放在了科学之“美”，而不是“恐怖”上。霍姆斯在真诚的结语中写道：“要使科学文化得以维持，我们需要三样东西——一个人的惊奇、希望的能量以及对全球未来鲜明而充满探求精神的信念。”然而，正是因为科技，全球的未来才成为了问题。若没有核武器和全球变暖，更不用提大型强子碰撞器，我们并不需要增强什么“希望”和“信念”——人类这个物种的延续在二十世纪之前是理所当然的。赫歇耳和戴维作为那个时代的英雄，如今已被另一个声明显赫的当代人弗兰肯斯坦遮蔽了光芒，这当然是有原因的。

Richard Holmes: *The Age of Wonder: How the Romantic Generation Discovered the Beauty and Terror of Science*, Pantheon, 2009.

鸣谢：季风书讯 合作媒体：



文章版权作者所有，欢迎订阅，转载请注明出处和订阅信箱：shrbooks@gmail.com，文章和图片如果涉及版权问题，敬请来信告知。

独立阅读主页：<http://chinairr.com.cn/>